

吉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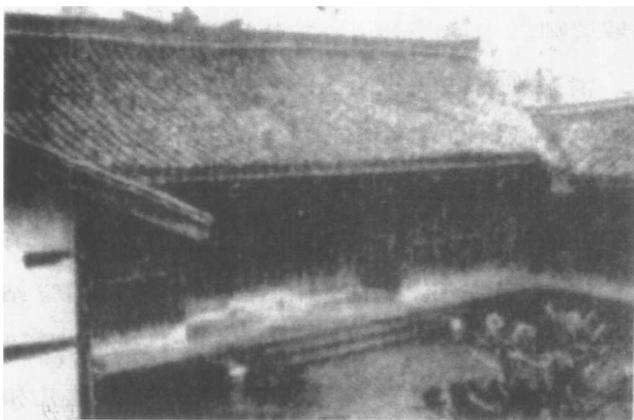
1906年3月21日，四川省南充县清泉坝罗春庭家里，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妈妈为了讨个吉利，因此叫他吉娃子。这就是半个世纪后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将的罗瑞卿。

清泉坝离城50里是个依山傍水的美丽山村。村边巍峨的青桐岭伸入嘉陵江中，使滔滔江水绕着小村子打了一个弯，由东向南流去。岭上长满了青桐树，树下是绿茵茵的草和各种野花。

清晨，山岭和江水都隐在柔纱一样的雾中。站在宽阔的江边，看不见行船，只听见船儿“吱呀吱呀”地响，船工用粗犷嘹亮的嗓音唱着川江号子。那歌儿和着鸟鸣，在江上飘，在山上旋，一直往云里钻。小小的吉娃子坐在江边大石头上，手端着下巴，听呆了，变傻了，好像心都跟着那歌声上了重庆、宜宾，不，飘到三峡神女峰那儿去了。外公和奶奶常常讲起长江、嘉陵江的故事，充满了神奇，充满了魅力。

太阳出来了，薄雾渐渐散去。岭上的青桐树，一株挨一株，密密匝匝，绿得耀眼，把江水都给染绿了。

罗瑞卿的父亲罗春庭是寡母带大的。他3岁丧父，分得一份较厚的家产，由寡母带着过生活，娇生惯养的孩子很难出息。罗春庭念了些书，可是，文不能吟诗作赋，算不会记账算钱，却抽大烟，下赌场，好吃懒做，害怕吃苦受累，一身坏毛病。



罗瑞卿故居

罗瑞卿的母亲鲜氏却是个难得的好女人。她父亲是南充县有名的大户，家有良田数十顷，还在南充县城买了房子，置办了地产，开了绸缎铺。鲜氏自幼喜爱学习，读过不少书，还写得一手好字。结婚以后，罗春庭不

认识的字还得向妻子讨教。

罗瑞卿到了记事年龄，父亲更堕落了。他不管田产，不问家庭经济，不读诗书，整天不是泡在茶馆里喝茶、摆龙门阵，就是到赌场去赌博，赌输了就回家要钱，没钱就拿着地契去卖地。他的寡母已经年迈，管不了他了，而妻子的话他不仅不听，还经常报之以拳打脚踢。

父亲不务正业，吸毒、赌博的坏习性日甚一日；母亲在繁重的家务和丈夫的折磨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中的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在父亲与母亲的矛盾中，吉娃子懂得了什么是丑恶和善良，什么是好与坏。他爱母亲，知道她善良、能干、疼爱儿女，他恨父亲，恨他好逸恶劳、吸毒、赌博，更恨他打骂母亲和自己。在父母的矛盾中，他坚决地站在母亲一边。

当父亲痛打母亲时，幼小的他除了陪着母亲流眼泪，为母亲擦流血的伤口，还能做什么呢？但他内心却懂得了替母亲分忧和不惹母亲生气。本来天真活泼的罗瑞卿，总是表现出心事重重的样子，无忧无虑的儿童气在他身上很少见到。他上课时好好学习，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也是规规矩矩，生怕惹出事来给母亲增加麻烦。可是，这些也减轻不了父亲对母亲的摧残。

有一天，吉娃子放学后回到家里，见父亲又在打母

亲。从来没敢对父母发过火的吉娃子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对着父亲大吼道：“不准打妈妈！”说着，上前护住被打肿脸的母亲。父亲被儿子的怒气惊呆了，他还没回过味来。吉娃子又大声谴责道：“你凭什么打她？你挑过一担水吗？你下田种地了吗？你割草喂牛了吗？你烧火做饭了吗？你穿的是谁做的衣服？你吃的是谁做的饭？你看看你像个父亲的样子吗？”母亲被惊呆了。她怕丈夫像对待自己那样暴打儿子，就挣扎着上前护着儿子。可是，愤怒的吉娃子却挣脱了母亲，站到父亲面前继续吼道：“你不是会打人吗？你打吧，打死我吧，但就是不许你打我妈。”在儿子的斥责下，罗春庭突然良心发现，知道自己错了，刚才的怒火全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个人回到屋里，倒在床上叹气去了。

吉娃子顶喜欢玉兰花。春天，那高大的玉兰树，开满了白玉兰花。远远望去，像一树瑞雪；近瞧，那一朵朵硕大的花，让人觉得是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白鸽。每当这时，他都牵着妈妈的手：“妈呀，看玉兰花去呀！”妈妈笑了。娘俩在玉兰树中间徜徉、漫步，空气中弥漫着香气，简直让人沉醉。

当然，他更多的是和小伙伴玩耍。他们在绿绒绒的草地上翻跟头、打滚，捉蚂蚱、螳螂，有时候看螳螂竖

起大刀打架；也常常摘些浆果吃，那果子可真甜，弄在手上、嘴上 粘乎乎的。

只有一样 他不敢下到江中洗澡。奶奶、妈妈 都不准他下水的，因为他的哥哥是下水玩给淹死的。从那以后，她们爱门前的江，也恨这江，不许孩子下去一步。

每天出门，奶奶总要在手腕、小腿上划上印，回来检查，要是印让水洗没了，那可不得了，也许要挨一顿打。不过，他是个听话的孩子，不让下水就坚决不下水，顶多站在岸边看小伙伴们打狗刨、斗水仗，所以他守在江边却不会游泳。

他们常常在野外玩得忘了回家，直到暮霭沉沉，炊烟袅袅 黑色的天幕渐渐罩住了大山、江水、田地 江中渔火闪闪，天空星光点点。

“吉——娃子 吉娃子唉 吃饭——喽！”

妈妈拉长声音站在田埂上喊了。

小伙伴们哧哧笑了。

“喊你哩，鸡娃子，鸡娃子肚饿回去叨米哩！”

有人取笑他，吉娃子和他们打打闹闹，回村了。

“哎呀 跑出去就是一天 洗洗手 吃饭。”妈妈疼爱地埋怨着，盛饭、端菜，把一大块炒蛋夹在他碗里。

他望望妈妈的脸，幸福地笑了。

聪明的学生

罗瑞卿 6 岁进私塾读书，他生得个头大，比同龄孩子高出半头，脑子也很聪明。虽然他对老先生讲的《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不太理解，但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先生教过的背下来。私塾学堂是古板和死气沉沉的，因此，孩子们都不喜欢这里的气氛，但罗瑞卿由于聪明、记忆力好，却很得先生喜欢。他在袁姓开办的私塾学堂读了 5 年，尽管有时也难免淘气，却没遭到先生任何体罚。

到了 11 岁，罗瑞卿的外公非要接他到鲜家沟读书。外公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他参加科举考试是个失败者，但在经营生意和田产方面却是个成功者。他有了钱，又想起年轻时未能考试及第更没当上一官半职的失意之事。他本想凭借丰厚的家财让儿子好好读书，以便圆一个升官梦。可是三个儿子，老大早亡；老二在上海读书，因与父亲有矛盾，同家中断绝了往来；老三年纪尚小。当外公看到一天天成长起来的外孙生得聪明，长得漂亮

结实，又是一脸的吉祥样儿，就在罗瑞卿身上找到了希望。他要罗瑞卿来鲜家沟读书的原因是，这里的私塾先生中过举人 学问高 再则 把外孙叫到身边读书 便于按照自己的意愿管教他。外公的封建意识很浓，辛亥革命之后好几年了，还张口闭口皇帝如何如何，脑袋后面仍旧拖着根长长的辫子。

罗瑞卿到鲜家沟读书的最初几年还是愉快的。离开了堕落无能的父亲，也离开了矛盾重重的家庭，这对于他认真上学读书很有好处。他在外公和外婆的庇护下，生活是幸福的。每天放学回家，外公时常检查他的学习状况，叫他背当天学过的内容。罗瑞卿总是流利地把所学内容准确无误地背出来。这很使外公高兴。特别是遇到教书先生夸奖罗瑞卿，外公更是像吃了蜜一样甜。课外时间，罗瑞卿能够尽情地和小朋友们玩耍。他可以带孩子们到外公的田里去吃甜杆，到外公的地里去割草，还可以带他们到外公的花园里去耍。尽管长工经常到外公面前去告状，可是，外公都能容忍，因为他对这个外孙太喜欢了。在他的身上，外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外公叫鲜锦堂，古板又守旧。他虽然不大喜欢罗春庭，可是为了门当户对，还是把女儿许给了他。结婚之

后，女儿回去，常常哭着对他讲罗春庭如何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何打她骂她。他听了，长吁短叹一阵之后，却说：“婚姻大事是前生定的，命该如此，命该如此啊！”

他的妻子死了之后，这回他却不讲门当户对，娶了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穷人家姑娘作续弦。所以吉娃子的继外婆，比自己的妈妈还小好几岁哩！妈妈按辈分称她为妈，然而又非常同情她的不幸，所以她们相处得很好，情同姐妹。

妈妈按外公的吩咐把吉娃子送来，对外婆说：“妈，唉，我把吉娃子交给你老了，他玩惯了，性子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老管着点。”外婆穿一身鲜亮的衣裳，脸色苍白，眼里闪着忧郁的光，她抚着吉娃子的小褂说：“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吉娃子是外公的心头肉哩！”

吃了午饭，外公去睡午觉，外婆要坐在一旁给他捶腰、捶腿。妈妈要走了，吉娃子拉住妈妈的手，叮嘱说：“妈，唉，你莫要管爸爸的事，省得打你，再说，我不在家……”他嗓音哽咽，说不下去了。妈妈揩着泪说：“别惦着家，好好念书，吉娃子，妈妈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你要争气，长大了做个有志气的人。”吉娃子鼻子酸酸的，泪珠终于从眼眶里滚了出来。

妈妈走了，出了鲜家大院，走上田埂，头也不回，他

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妈妈瘦削的身影在山坡上晃动，一会儿变得模模糊糊，进入青翠的竹林不见了。泪，无声地流下来，挂在腮边。他第一次尝到离开母亲的孤独滋味，更为母亲痛苦的生活担忧。

鲜家祠堂的私塾先生果然厉害。他头戴红缨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留一撮小黑胡，两只眼睛又黑又亮，总给人一种威严的震慑。但书他确实讲得透，旁征博引，使吉娃子十分敬服，因此，吉娃子学得也特别认真。回到外公家，外公常常坐在太师椅上，拖腔拖调地说：“吉娃子唉，背一段给外公听听哎。”吉娃子便站在一旁，高声背诵起来。遇到外公高兴，还会讲一段东周列国的故事，教训他应如何尽孝尽忠，光宗耀祖。

外婆对他虽好，可他仍时常想妈妈。事情正如他担心的那样，爸爸接连输钱，卖田，妈妈不许卖，他又打了妈妈。后来，爸爸梦想捞回来，赌博时下了大赌注，结果，被人家合伙欺骗，输得更惨。这次，大部分田被卖掉了，妈妈回娘家对外公哭诉一番。外公有什么办法呢？叫佣人把爸爸找来，骂了一顿，爸爸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一再表示从今以后改邪归正，可是一路过赌场，他又走不动了。

吉娃子躺在床上，常常对着窗外清冷的月光出神，

他心里问：“月亮婆婆，你看见我妈妈了吗？她在干什么？她哭了吗？小弟、小妹们睡了没有？”窗下蚩蚩叫，他怎么听怎么像妈妈轻轻的抽泣声。于是，他的泪滴在枕头上，他暗暗下决心：“不哭，就不哭。现在做一个好孩子，长大了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样，妈妈就不会发愁，就会笑了，对，应该孝敬妈妈，叫她过上好日子！”

接受新思想

少年罗瑞卿利用外公的支持和资助读完了小学。13岁时，他又在外公的支持下进了大林寺城北寄宿学校读书。这里和私塾的教学方式大有区别，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等。学校老师中，有些经过新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了解社会和国情，所以，在教学中常常把一些爱国意识和救国救民的思想灌输给孩子们。

老师们怀着满腔的愤怒，给同学们讲述鸦片战争，讲述政府的腐败无能，讲述列强如何侵略和瓜分中国，讲国人是如何衰弱和无力。老师们的宣传，使这些刚刚了解社会的孩子们开始懂得国家和民族的状况，萌发出痛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救国救民而学习的思想。

少年是天真的，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新思想，而且易于冲动。罗瑞卿在大林寺城北小学读书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学校为了增加校舍，准备拆除祠堂内大雄宝殿中的佛像。当一名教师准备带领学生们去拆除佛像

时，有些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学生议论说，打坏了佛像要遭报应。老师只好先集合学生讲解破除迷信的道理。这时，学生中不见了罗瑞卿。正当学生们讨论老师讲的道理时，罗瑞卿高兴地回来了，他对同学们说：“我刚才打掉了如来佛的头，还打掉了他两旁的两个罗汉，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五四运动前传播新思想的进步刊物

一点事也没有。如果佛像有灵，我就不会回到这里了。”学生们听完罗瑞卿的话，不再争论了，一拥而上，砸了

寺庙中所有佛像，清理出大殿，扩展了学生们的教室和宿舍这件事使同学们很佩服罗瑞卿，都说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

在外公的资助下，罗瑞卿顺利读完了高等小学，并于1923年考入县立南充中学，著名进步人士张澜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这年春天，罗瑞卿的家庭又发生了变故，母亲病重卧床，家中少了出力干活的人。有一次，罗瑞卿回家探望可怜的母亲，父亲看到已长到成年人高的儿子，就在他身上打起主意。他发现本村几个富裕的人家都把儿子送进店铺学徒，既省钱又能培养人，于是他强迫儿子退学。

外公的支持与羁绊

罗瑞卿退学之后，父亲按照自己的意志，把罗瑞卿送进了南充县城小东街的一个绸布店当了学徒。被迫放弃学业当学徒的罗瑞卿，每天的任务是倒尿壶、卸门板、扫屋子、生火炉，还有刷锅洗碗。这对于一个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可是，父命难违，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亲强迫他这样做，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不久，更使罗瑞卿为难的事出现了：父母强迫他与一个林姓姑娘成婚。父母的行为使少年罗瑞卿对这个家庭厌恶透了，他逐渐萌发出离家远走高飞的意识。

罗瑞卿被迫辍学当学徒的事儿，外公一点也不知道。有一天，罗瑞卿正在为店主打扫店门前的大街，长期住在城里、饭后在大街上溜达的外公发现那扫大街的少年有点像自己的外孙，就好奇地走过来。他过来一看，吃惊不小，当时就责问道：“我出钱让你上学，是想让你日后有个出息，可是，你咋不思进取、跑到这里给人家当奴仆？”罗瑞卿听了外公的训斥，很委屈地讲出了

事情的经过。

老爷子听后大怒。他立即喊了顶轿子，怒气冲冲地下乡来到清水坝，把女儿和女婿痛骂了一顿，然后强迫他们立即进城，为罗瑞卿辞去学徒，返回学校上课。两天之后，外公又把罗瑞卿送回了南充中学读书，并答应支付他的学习费用。

是外公给了罗瑞卿重新学习的机会，他本该感激外公，然而，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罗瑞卿越来越与封建意识极强的外公想不到一起去了。外公对他约法三章，即



省港大罢工示威游行

只能规规矩矩读书，不能参加任何党派，更不准看各种进步书刊，否则将停止对他的经济援助。可是这已经是1924年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在加深，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了3年，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进步的爱国志士更是到处宣传救亡思想。南充中学在校长张澜和其他进步分子的直接影响下，反封建、反压迫、反军阀的斗争正热火朝天地展开。任何有志青少年，都不能不受这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的影响，何况，罗瑞卿又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那追求进步的强烈意识，使他早把外公的规定忘得一干二净。他不仅参加了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还成了运动的带头人。

1924年的春夏之交，南充中学的学生在进步老师的鼓动下，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征收“佃当捐”的斗争。学生们分成东、南、西、北四路队伍，向各乡宣传为什么要反对“佃当捐”，揭露军阀剥削农民的罪行，阻止军阀何光烈派出的收捐人员。罗瑞卿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还成了骨干分子。这事让外公知道了，他考虑到外孙是初次违反他的约定，向他发出严重警告之后，原谅了他。

孙中山逝世后，学生们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罗瑞卿准备参加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活动时，外公知道

了，就找到学校对他加以训斥，指责罗瑞卿拿了他的钱，吃着他的饭，不好好学习。罗瑞卿给外公讲解这个戏剧的政治意义，满脑子封建意识的外公自然听不进去，两个人大吵了一场。

这件事使祖孙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外公对外孙的行为越来越不满意，而外孙越来越感到外公落后，两人矛盾越来越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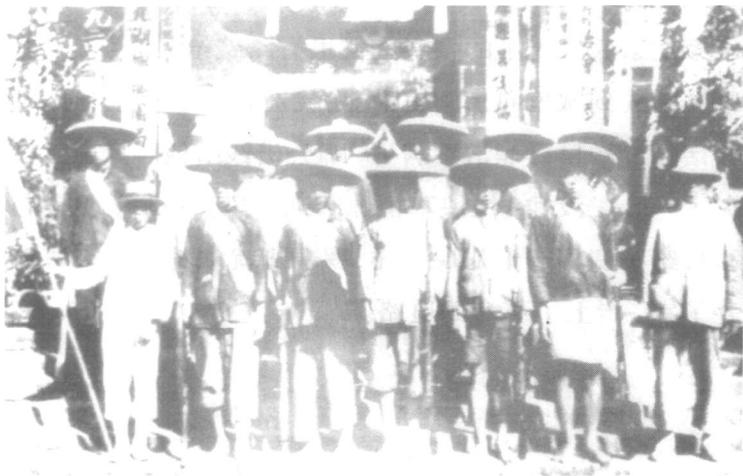
选择风险之路

当少年时代的光阴快要结束时，罗瑞卿面临多种选择。一条路是按照父亲的意志学习经商，将来赚钱为生；一条路是外公为他确定的好好读书，顺从封建军阀势力，以便将来混个一官半职，第三条路是投身到火热的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去，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对于父亲指出的路，罗瑞卿很容易给予否定。可是，外公为他指的路和投身进步事业的斗争，前者可以过舒服日子，从外公那里得到充足的物质支持；而后者仅仅是一种理想，在为理想而斗争的道路上，充满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如果选择后者，他很快就会面临外公断绝经济资助的威胁，所以，走这条路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靠什么为生？

外公对罗瑞卿的关注始终没有放松。为了了解外孙的学习和行动，老头子强迫外孙搬回家中居住，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外孙设计道路。起初，罗瑞卿对外公的干预和限制还能忍受，随着年龄的增长，独立意识逐

渐形成，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道路。进步思想和救国救民的意识，强烈地吸引着他。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在全国引起的进步思潮，很快就在南充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像吴玉章等直接到南充活动，宣传救国思想，宣传共产主义，并在南充中学秘密成立了共青团组织，罗瑞卿成为这个组织的培养对象。

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罗瑞卿逐步确立起自己的革命意识。他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活动，这严重违背了外公的意志，罗瑞卿也知道其后果，但是为了理想，他甘愿冒与老外公决裂的风险，革命的宣传活动进一步



1924年成立的广东花县农民自卫军

扩大。不久，从广州黄埔军校回来的共产党人活动分子根据党的指示到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罗瑞卿积极参加了这项活动，他胆量进一步增长，根据组织的安排，到南充军阀何光烈的部队从事兵运活动。后来，南充成立了工会，罗瑞卿主动到工会担任夜校教员。

外公对罗瑞卿的行动越来越不满了，他开始派人盯梢，观察罗瑞卿的行动。罗瑞卿随时都想着到外地去从事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只是未找到适当的时机。母亲的死使他对家庭彻底失望了，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他向父亲宣布，要到成都去读书，要求父亲提供路费。可是，已经把家底败光了的罗春庭哪里有路费给儿子，于是就厚着脸皮到城里向岳父去借。岳父对这个败家子和那不听话的外孙早已非常不满了，哪会借钱给他。罗春庭自讨了一肚子没趣，怏怏不悦地回到家里。最后，还是老祖母给了罗瑞卿十几块大洋，罗瑞卿就拿着这点路费离开了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黄埔学员

1926年7月，罗瑞卿和同学郑培济结伴走旱路到达成都，不久便考上了高等蚕桑学校。但是，因为没钱交学费，无法入学，罗瑞卿在成都逗留了二三个月。这时，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他听说黄埔军校要到重庆招生，心想“国家这么乱糟糟的，学蚕桑也未必能够救国。”便打算投笔从戎，投考军校。不久，罗瑞卿乘船到了重庆。在重庆，他见到了已先期到达这里，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并通过他结识了任伯芳、任启愤等共产党员，听了共产党员杨*公、刘伯承的演讲。他对任白戈等再次提出自己想去国民革命军的愿望。这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来重庆招生，欲吸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入校。任白戈介绍罗瑞卿去报考，被武汉分校录取。

1926年冬的一天清晨，浓浓的冷雾，包围着整个重庆，街道、楼房、山崖、树林、汽车、人力车都变得虚无缥缈，时隐时现。在这浓雾中，罗瑞卿提着小箱走向码

头，箱子里只塞了两件半干的衣服。

码头前有一排宽大的石阶 要下几十阶 才到船坞。

上了船，昂头望去，石阶隐约可见，山上的房屋则渺渺茫茫，不大真切。

汽笛长鸣，轮船离开码头，向东驶去。

他站立船舷，任阴冷的江风吹拂，激动与喜悦，似脚下翻滚的江水，往心头涌来。

“再见了，家乡，再见了，亲人们！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样子啊 你该变 是的 家乡 应该变！”

同行的几十人中 有徐彦刚、任伯芳、张锡龙、游曦和赵一曼等。

第二天，旅客们早早地涌向甲板，要观赏三峡两岸旖旎秀丽的风光。罗瑞卿、赵一曼也出来了。赵一曼个儿不高，梳着短发，身着朴素大方。

三峡秀色不断引起人们一阵阵惊叹。尤其是奉节县瞿塘峡口 两侧黑石垒垒 如猛虎 似恶狼 只留下一条狭窄的水道，轮船似乎成了蹑手蹑脚侧身行走的小姑娘。这就是长江上险中之险的滟*堆。这里，不知沉下多少船只 淹死了多少好汉。“滟*大如马 瞿塘不可下。滟*大如牛 瞿塘不可留。”这首当地民谣 就是滟*堆的真实写照。船行到这里 波浪高 旋涡多，一个个大涡

套小涡，令人头晕目眩，不少人惊怕得叫了起来。

船终于顺利通过，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轮船出了川江峡口，江面忽地开阔起来，两岸山势渐小，现出了平原，此时，已进入湖北境内。

他深深地吁了几口气，回望巴山蜀水，陡然想起了苏东坡那豪放的千古绝唱，遂低低吟诵起来：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武汉，当时是国共合作的中心。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许多共产党人都在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担任要职。

黄埔军官学校第二分校，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全校男女学生大约 3000人。校长名义上是蒋介石，但他很少到学校来，校务委员会负责人为邓演达、谭延*、恽代英、徐谦等。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教官有施存统、萧楚女、许德珩等。

老师和学生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所以右派力量很小。

罗瑞卿投身于这样一所革命的学校，真是如鱼得水，更为可喜的是，他所景仰的李鸣珂老师也在这里。一个新的天地，一种全新的生活在他面前展开了。

聪明好学的罗瑞卿，对二分校所授的军事课学得特别认真。有时，也能听到黄埔军校的长官训话。蒋介石知道这所学校共产党力量大，他来了，也只是讲讲话就走，从来不多呆。

蒋介石第一次来，罗瑞卿极感兴趣地看着他，想听听这位北阀军总司令说些什么。

“本校长对你们有慈母般的感情，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蒋介石挺着胸脯说：“是的，本校长很疼爱你们。”接着讲他妈妈如何如何想他，他们母子如何情深。

罗瑞卿听得直倒胃口。校长不是家长，什么“慈母”什么“疼爱”这不是笼络人心吗？堂堂总司令就这么个水平啊。

蒋介石又一再申明他忠于总理遗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讲着讲着，突然手一举，使劲拍拍胸脯：“本校长一向是革命的，假如我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

他觉得好笑，革命不革命，不是靠自己发什么宣言，而是要看行动。这句话，他牢牢记住了。

军事课最苦最累，不过罗瑞卿也最喜欢。他认定：一个革命者，不但要有马列主义武装思想，还要学会军事技术。枪握在手里，就不怕反革命进攻。

军事课目包括队列操练、班排进攻、野外演习、瞄准射击等。他们的军事教官好凶，有时甚至骂人：“你他妈怎么搞的，重来！”你是死人吗，动作要快，冲妈的，上！

学员们大都是中学生，有不少人在家里是父母的宠儿，哪受过这个，心里不痛快，动作越发机械、缓慢。

罗瑞卿是班长，他做大家的工作说：“他脾气不好，骂人难听，可他心是好的。想想看，是操场上挨两句骂，上了战场打死敌人好；还是操场上过得去，上了战场砰的一声被送回老家好？”

大家给逗乐了。

其实，这位教官也没少难为他。

正在练习冲锋，军事教官手一挥，厉声叫道：“罗瑞卿，你牺牲了！”他听了，只好老老实实躺下去。有一次，恰巧身下有一只死麻雀，他身子移了一下。坏了，军事教官又叫了：“罗瑞卿，你死了怎么还能动弹？躺回去！”死麻雀的血水沾到身上，腥臭扑鼻，一直到下课，他才咬着牙跑到水龙头前去冲洗。

武汉是我国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奇热。他们出操、上课，都必须武装整齐。军装一穿上，就是满身汗下了军事课，胸前、背后，到处是红斑斑的痱子。罗瑞卿个子高大，一举一动总为军事教官注意。一天下午，部队紧急操练，罗瑞卿又被他定为“牺牲”了。罗瑞卿躺在地上，简直像爬进了火锅。上面太阳烤得难受，下面地热得火燎燎的，呵，快煎成肉饼了。军事教官在老远的地方讲动作，作示范，大约把他给忘了，他就那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分校）旧址

么躺着，一动不动。有的同学偷着给他打手势，叫他坐起来活动活动。他坚持躺着，“牺牲”了嘛，不会动啦！

过了好一阵军

事教官才想起他 急忙叫他起来。这时 他浑身透湿 脸色血红，大汗珠子跟雨点似的“巴哒巴哒”往下掉。

教官见了，激动地对大家说：“你们看，罗瑞卿同学 这种精神值得称道 军人 就应该这样。”

后来罗瑞卿反复练习低姿势冲锋，高大的个子终于能伏下了，军事教官才不再判他“牺牲”了。

这件事，给不少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赵一曼便对他说过：“你的刻苦精神 将使我们终生难忘。”

一天，军事教官突然生病，罗瑞卿把他从教室背到卫生室，这使他深为感动。事后他说：“我没少难为你，以为你一定会生我的气 想不到 你对我这样好。”罗瑞卿说：“您对我严格要求是对的 严格训练出精兵 我吃了苦头 可内心是感激您的。”

罗瑞卿很着急转党问题，当时规定，共青团员经过考核，可以转为党员。他几次想找李鸣珂谈，可又不大好意思。当时党是秘密活动的，谁是党员大家都不知道，罗瑞卿是从李鸣珂的言行中认定他是党员的。

一个星期天，李鸣珂特地约他坐船过江，到黄鹤楼去玩。

这时已是 1927 年 3 月。

李鸣珂问他现在革命形势如何？罗瑞卿说：“不错

呀 你看 连孩子都会唱‘打倒列强’ 工人农民都发动起来了，我心里真痛快。恨不能回四川也这么大干一场 这比反‘典当捐’声势大多了。”

李鸣珂却闭住嘴，严肃地看着他，不发一语。

他很惊讶：“怎么 李老师 我说的不对吗？”

“要深入观察和分析啊！”李鸣珂手扶白玉雕栏 把目光射向大江；有一股逆流 你没注意到？

逆流？什么是逆流呢？

“国民党右派，在叫嚷农民运动过火，工人运动过激，他们下令叫武汉工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土豪劣绅逃进城里 天天诬蔑农民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李鸣珂语调深沉地说：“革命在经受考验 也可能出现波折。”

罗瑞卿心里很不平静，真的，这些事怎么一点没注意到？是小资产阶级的头脑发热，把革命看得太简单了吗？

“上海工人起义 前后历经三次。尤其是第三次 蒋介石带领北伐军到达上海郊外，为什么按兵不动，不进行配合？”李鸣珂用手拍拍雕栏：“要动脑筋想 要有应付事变的准备。”

这太意外了，难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要失败？工人农民的力量还要被打下去？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图为讲习所学员宿舍

回到学校后，他非常注意阅读报纸，从一条一条消息中寻找情况和问题。这样，暂时放下了自己的转党问题，没有提出来。

3月，武汉发生了一件大事：武汉人民坚决要求收回英租界。因为英租界里隐藏着许多土豪劣绅，帝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英租界所谓享有“治外法权”肆意侵害中国人民利益。

消息传到学校，学员们一致响应，罗瑞卿更是兴奋异常，草拟宣言、演讲稿，张罗着糊游行用的小三角旗。学校决定进行军事示威，配合武汉人民群众，把武汉最

繁华、漂亮的街道从英国佬手里夺回来。

3000人的军事武装部队整齐地走在英租界上，人民群众也蜂拥而上。顿时，军号声、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英国佬开始满不在乎，以为还像过去一样，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因而，还三三两两站在楼房阳台上照像、观看，比比划划。群众气极了，一时间，汽水瓶子、西红柿、辣椒像飞弹一样投过去，他们惊慌失措地钻进屋子，再不敢露面了。

罗瑞卿在队伍里，不住地带领学员们喊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坚决收回英租界！”

“不许列强侵略中国！”

“英国佬滚回去！”

在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英国佬认输了，把英租界主权交回了武汉市政府。

许多商店、工厂燃放鞭炮表示祝贺。

但是，回到学校，一个代表国民党右派观点的学生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说：“革命就是学学三民主义，干什么去刺激英国人？人家大兵舰开过来，咱们打得过吗？”

罗瑞卿本来正在洗脸，一听这话气坏了，说：“你再说一遍！”

“就说咋啦？”那人梗着脖子，一副傲慢的样子。

“你这是胡说！”罗瑞卿说，“革命就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怎么是学学三民主义？”

“说得对！”不少同学围过来。

“怕帝国主义就永远受帝国主义欺侮！请问，你得到英国佬什么东西了？为什么替英国佬说话？”罗瑞卿逼问着。

“你别血口喷人，你——”那人脸一阵发红。

“他爹在英国洋行吃英国佬屁的家伙，”一个同学兜出了老底。

“你胡说，你——”他气极败坏地想溜。

罗瑞卿说：“不行，你回来！”拉住他：“咱们要辩个水落石出！”

他和十几个同学批得那家伙脸红一阵白一阵，额头上直冒汗，最后低声下气表示承认错误，大家才放了他。

后来，他把这事告诉了李鸣珂。李鸣珂听了说：“这恐怕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国民党右派想动手啊！”

勇斗洋人

1927年上半年 经任伯芳、陈刚介绍 罗瑞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 蒋介石指使夏斗寅部叛变 进逼武昌。在这紧要关头，共产党人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湖学兵团等单位组成中央独立师，由叶挺指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罗瑞卿被任命为排长。从此，罗瑞卿开始走上了军事指挥的道路。在独立师里，有一则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罗瑞卿勇斗洋人”的故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一天，罗瑞卿正带着几个人在武汉江汉关执行警戒任务。突然，发现江面上有一条中国小木船，在一艘洋人的火轮追逐下，几次差点翻沉，而火轮上的洋人则以此取乐，发出阵阵狂笑。洋人火轮紧追小木船不舍，最后，终于将小船撞翻了。

罗瑞卿见此情景，怒不可遏，马上让传令兵挥动信号旗，示意火轮靠岸。然而，火轮根本没有把这几个中国军人放在眼里，继续我行我素。“鸣枪警告！”罗瑞卿吼了一声。随着几声枪响，洋人这才止住狂笑，惊讶地转身一齐往岸上看。“过来！”罗瑞卿又是一声大喊。面对这条挥动着手枪的汉子，洋人才意识到真的不妙，小火轮只好向岸边开过来。

靠岸以后，一个大鼻子洋人非常傲慢地从火轮上走下来，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奴相十足的中国翻译。还没等洋人开口，中国翻译便抢先冲罗瑞卿等人骂了起来。

罗瑞卿的气不打一处来，看这家伙狐假虎威的架势，问他：“你是中国人吗？要是你把腰杆挺直点，有老子给你撑腰，洋人捏不碎你的卵子。要不是中国人，你给我靠一边去，用不着多嘴多舌。”那翻译被罗瑞卿一顿

臭骂也破口骂道：“给你二尺军装就不知天有多大，你诈唬什么，误了麦皮尔先生的大事，我告诉你们长官剥你的皮！”说完，陪着洋主人就想离开。

“不许走！”罗瑞卿喝道。“干什么？”洋奴翻译强打精神质问道：“你们想干什么……叫你们长官来！”

“我就是长官！”罗瑞卿说。“你？”洋奴翻译轻蔑地笑笑：“你算什么官……不跟你们瞎嚷嚷！”洋奴翻译又想溜。

罗瑞卿抬起枪口，砰的一声打在洋奴翻译前面的路面上。“走，没那么容易，我的子弹就在那儿等你！”说完，又放了一枪。

这一下，把大鼻子洋人吓坏了，连忙摆手，露出一副可怜相：“No, No 先生，慢慢说，收起你的家伙！”

洋奴翻译也吓得脸色惨白，问道：“你，你们凭什么开枪？”

“凭什么？看看那只渔船，是被你们撞翻的。告诉你，这是中国的长江，轮不上你们来摆威风，现在我命令你们，脱下衣裳，去把小船拖上岸来，向船上的人赔礼道歉！”

洋大人们面面相觑，面对滔滔江水几条腿杆直打哆嗦。

“脱！”一个战士拉了拉枪栓。

“别……别开枪 我们脱！”洋奴翻译连忙鞠躬又向洋大人叽咕几句，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脱下衣服。脱着脱着，洋大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洋奴翻译也跟着跪下，说：“长官高抬贵手 我们不会游泳，下去要出人命啊！”

见此情景，围观的群众哈哈大笑，罗瑞卿大手一挥，对战士们说：“不会游泳可以学 把他们扔下去 让他们练习练习。”几个战士一拥而上 不由分说 推的推 抱的抱，哪管洋人和洋奴才杀猪般地嚎叫，全把他们扔进江中……

不久，一份抗议声明飞到独立师师长叶挺的办公桌上。叶挺把罗瑞卿叫到办公室，问明情况，也是一阵大笑，说：“干得好 让他们抗议去吧 我顶住，下次再在中国的江面上为非作歹，还把他们扔到江里。”

找红军去

1927年7月15日，武汉分校被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罗瑞卿任副班长。8月2日部队东征讨蒋，到达九江，被已开始反共的张发奎缴械，同学们纷纷离队。罗瑞卿此时正在患病，也带病离开队伍，同一位四川老乡冯开琮一起回到武汉。

这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他们又从武汉来到常德。1928年秋，罗瑞卿来到上海。

1929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去湘鄂西贺龙部队，走到宜昌，交通断了，他又返回上海。3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打下了福建汀州。于是，中央军委又派罗瑞卿到红四军去工作。红四军返回江西后，他又被派到在闽西上杭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当教官。罗瑞卿到达上杭县蛟洋后，与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傅伯翠会合，将参加过永定、蛟洋暴动的游击队员分批集中，进行训练，教游击队员们出操、射击、打野外，给游击队员们讲政治课。罗瑞卿服装整洁、口齿清晰，说话鼓动性

强 深得队员们爱戴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罗老师”或“罗教官”。这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开始有了战斗力。在此基础上，罗瑞卿又向游击队员们进行党的教育，发展贫苦农民入党，建立党支部。

5 月间，红四军再次入闽，罗瑞卿闻讯后即率领游击队到上杭北面的新泉、庙前去迎接，然后随红四军主力于5月23日攻克龙岩。26日，上杭一带游击队编为红59团，傅伯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长汀水口村。1929年5月，红4军从这里跃过汀江第二次入闽

死而复生

1930年6月红军主力整编 罗瑞卿任红11师政治委员。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敌人三面包围之中隐蔽待机25天。5月13日，敌王金钰和公秉藩师离开富田向东固开进。5月16日，红四军为右路军一梯队，由东固向富田进击。在这40里长的山路上，敌军抢先一步，占领了九寸岭和观音崖两处险要隘口，严密地扼守红军必经之路。

先头部队红11师政委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赶到前沿察看地形和敌情 只见这里悬崖陡峭 怪石嶙峋 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山头上摆满了轻重机枪和小炮 敌人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

“报告！”军部通讯员呼哧带喘地跑来 向罗瑞卿和曾士峨说：“军长命令你师 迅速拿下九寸岭和观音崖，为全军打开道路！”

“晓得了！”曾士峨回答道 并用下巴指了一下前

方征询罗瑞卿的意见：“刻不容缓，只有强攻了。”

“趁敌人立足未稳，强攻！”罗瑞卿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攻击开始了。战士们一手提枪，一手攀着山石、草木，艰难地攀登。麇集山头的敌人疯狂地扫射，密集的子弹向下倾泻着，炮弹、手榴弹四处爆炸，山石崩飞，黑烟翻腾，不少同志被击中跌下山来。

眼看攻势受挫，罗瑞卿心急如焚，对曾士峨说了声：“你指挥，我上！”

没等答话，他便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冲上去！”

战士们又集结起来，跟着他向上冲击，呐喊声震撼着山谷。顿时刀光剑影，杀声震天。

眼看着就要冲到山顶了，罗瑞卿一边举枪射击，一边喊：“打开前进的路，同志们，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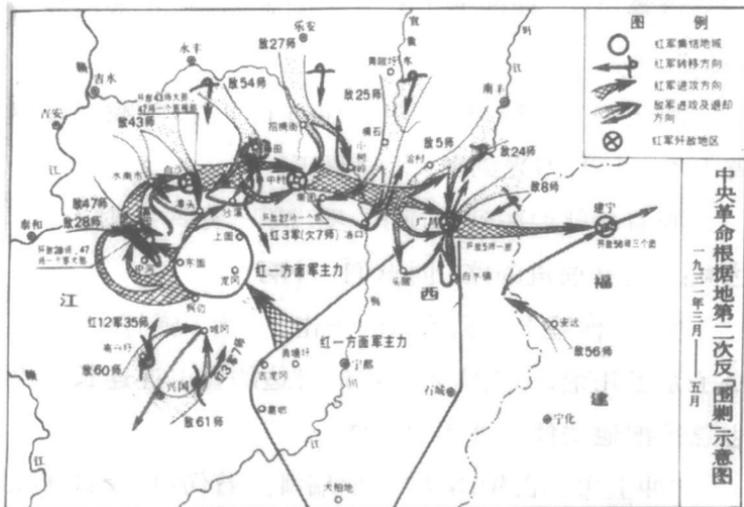
突然，他脸上受到重重的一击，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身子歪了几歪，一直紧紧跟在他身边的警卫连连长杨得志急忙把他扶住：“罗政委，你……”

“冲上去，占领山头！”罗瑞卿捂着伤口，咬着牙喊着。

杨得志痛心地把罗瑞卿放好，看着山上顽抗的敌人眼都红了，狠命地把一梭子弹打了出去：“为罗政委报仇，冲啊！”

“为罗政委报仇，冲啊！”雷鸣般的呼喊声响起，一队又一队的红军战士从罗瑞卿的身边奔过，争先恐后地向山头冲击。敌人的阵地很快被占领了，全军的通路打开了，但是罗瑞卿却成了血人。

卫生队长叶青山很快赶来查看伤势。只见子弹打在罗瑞卿的左腮部，贯耳而出，颧骨被打断了，伤了动脉，血一个劲地向外涌流。叶青山打开药包，迅速为他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示意图

进行急救包扎，血被止住了。由于失血过多，罗瑞卿昏迷了。师长曾士峨命令叶青山：“立即护送罗政委到后方抢救！”

抬到后方医院的时候，血把担架都染红了，医生们在旁轻声说：“恐怕活不了了，通知后勤做棺材吧！”一会儿，隔壁屋子里果然传来拉锯子钉木板的声音，两个做棺材的人还说：“棺材要做得长一点，那个人可高啦！”这些话罗瑞卿都听见了，他想，这次自己真的活不成了几天之后，这个顽强的汉子居然又活过来了。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后曾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拒不报到的人。不久，毛泽东、朱德派来一位叫杨光池的同志专程看望罗瑞卿，并对杨光池说：“正在打仗，我们分不开身，你先代表我们去看看罗瑞卿同志，告诉他安心养伤，同志们给他报仇！告诉医院的同志，一定要保住罗瑞卿！多带些战利品，去慰问一下罗瑞卿和住在医院的同志们！”

1931年10月，罗瑞卿伤愈出院，在瑞金参加了全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此间，罗瑞卿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想留罗瑞卿在总政治部工作，罗瑞卿表示想回部队，毛泽东接受了他的要求。随后，罗瑞卿回红四军担任了政治部宣传部长兼随营学校的政委。

红四军政委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不顾毛泽东的异议，决定进攻赣州，付出很大代价，打了33天，无功而返。

3月间，组建一军团新的领导机构，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王良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

同月，根据毛泽东的倡议，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了东路军入闽作战，攻打漳州。王良、罗瑞卿率领红四军担任主攻，4月19日突破敌人十二岭、风霜岭主阵地后于20日占领漳州。23日，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红四军前进到海边的石码镇。部队的开路先锋是由10师师长陈光带领的100多名精干的红军战士，每人都背着刀把裹着红布的大刀，提着驳壳枪，威风凛凛，后面还跟着两辆汽车。

当地的保安队长李玉泉误以为是孙连仲的部队19路军，竟在街上摆下茶水、糕点，恭候老总们大驾光临。因此，当红军先头部队进入石码时，当地地下党组织也

有些疑惑了。直到曾志来到石码，这个误会才解除。

曾志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女同志。1930年夏天，她同丈夫蔡协民调到厦门做地下工作。红军打漳州前，曾志得到了消息，急于过海到石码来，但一时没有班轮，便搭了一艘粪船到石码。经过她向地方党组织的解释，地下党才同红军取得联系。



红军时期，罗瑞卿（后排左一）同聂荣臻（后排左二）、左权（后排左三）、朱瑞（前排左一）在一起

在石码，召开了庆祝漳、码胜利群众大会，罗瑞卿即席讲话，由于当地群众听不懂北方话，由当地干部林曼青当翻译。罗瑞卿不带稿子，台前一站，双手叉腰，就讲了起来。

他首先说：红军初到此地，因为有些情况不了解，致使反动分子来欢迎我们，而我们的基本群众倒不敢和我们接近了。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接着他对红军战士说，这次红军来到漳州、石码，和过去山区环境不同，同志们不但要注意军容风纪，还要遵守城市政策。不要看见洋房子就认为是土豪的而乱打，打土豪之前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不要搞错。

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们要用事实揭穿他们的谣言，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

接着，他又运用刚刚了解到的材料说：此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张毅换张贞（二人都是当地军阀）捐税加二升。昨天我问过一个老阿婆，她说她的一只小猪娃到养大卖出去，共缴了6次税！红军来了，就是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老百姓直起腰来……

罗瑞卿常对人说，他在武汉军校时最佩服邓演达的口才，而对蒋介石说起话来“这个这个”不敢恭维。而自

从他自己当了红军党代表之后便更以讲话有鼓动性、能抓住听众而著称。在他讲话的风采上，不仅可以看到邓演达的影响，而且又揉进了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调查研究的新的风格。

红四军在石码 驻扎于水头、海澄、东美、角美、石美、海沧等地 前锋到达海边 与厦门隔海相望。当时在厦门停泊有列强各国 20 余艘军舰。他们常将军舰开到石码附近，在夜里用探照灯向岸上扫描，由于红军加强了戒备，未发生武装冲突。

王良、罗瑞卿率领红四军在石码、长寿等地驻扎了 40 余天。这一期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帝大同盟，并由革命委员会出面，经过调查，没收了敌产，对工商业者进行筹款，并在周围农村打土豪，所得财物部分分给群众，部分运回苏区。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当地苏维埃政权，吸收了数百人参加红军。其中有海外归来的华侨，有学生、工人，还有一位台湾籍的小提琴演奏家蔡乾。有 20 多位司机向中央苏区运输物资，随后便参加了红军。

6月13日，红军主动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内的地主武装凭借高墙深沟，向红军队伍打冷枪 妨碍红军前进。为了攻打大禾镇 王良、罗瑞卿和参

谋长粟裕，由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连长带路，来到大禾镇外一间破屋内观察地形。

王良、粟裕和罗瑞卿正用望远镜观察，镇内打来两枪，王良突然倒下，罗瑞卿和粟裕赶紧去扶，但他已中弹牺牲。罗瑞卿和王良有深厚友谊，他十分悲痛，不愿承认王良已死，大禾镇攻克后，仍然用担架抬着王良的遗体，直到进入苏区，在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才将王良安葬。王良留下一块怀表，罗瑞卿一直珍藏着。每逢战斗胜利，他就要打开包着这块表的红绸，给表上满弦，同时低声说道：“我们又胜利了！”在他心目中，王良仍然活着。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随即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省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8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

一军团保卫局长

1933年1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7、9、10、11共四个师。罗瑞卿归队后被任命为军团保卫局长。

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开始。2月27日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领7师、9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10师和11师参加了歼灭敌52师的登仙桥伏击战。这一天大雾弥天，对面不见人。

敌52师和59师兵分两路由乐安东进，52师在南，59师在北，中间隔有磨罗嶂大山，联络困难。

红一方面军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命令一、三军团和第21军为左翼队在南面伏击第52师，以第五团、第22军为右翼队，在北面准备歼灭第59师。左翼队以一军团的10师、11师、9师、7师和三军团的顺序由西向东在敌52师前进道路之南侧设伏。13时，骄横之敌毫无戒备地全部进入红军伏击地域。

总攻开始后，罗瑞卿、徐彦刚命令第7师首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蛟湖，将敌行军纵队切断，同时，指挥第7、第9师主力向进至大龙坪的第52师师部猛攻。部队刚冲下山半个小时，前面就来指挥所报告，第52师师长李明已被活捉。



反“围剿”中的工农红军

3小时后，一军团歼其师部和一个旅，三军团歼其另一个旅，52师被全歼。至28日敌59师大部为五军团所歼。3月下旬罗瑞卿又随林彪、聂荣臻参与了歼敌11师的草台岗战斗。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结束，加上到陕北后又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罗瑞卿任保卫局长约3年半时间。

罗瑞卿任一军团保卫局长时，保卫局下设侦察部

(队长谢志群和执行部 部长钟人仿)保卫的任务有四个方面：

1.训练警卫员 保卫首长。罗瑞卿为了保卫首长 在行军、作战时，除因另行分配任务需离开的情况指定保卫局其他人代替外，总是跟着林彪和聂荣臻，不离左右。他后来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长时，只要是毛泽东外出巡视或开大会，罗瑞卿总是站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要走的路，要去的地方，他都要事先检查一番，布置好警卫，以保证万无一失。有了这位大警卫员，毛泽东对自身安全十分放心，因此，尽管他的身高与罗瑞卿不相上下，但仍常说：“天塌下来不怕 有罗长子顶着。”

2.巩固部队，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部队进行破坏，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行军时 组织拦阻队(后称收容队)防止开小差。

3.查清俘虏。

4.在边沿区或在白区驻扎、行动时，进行社会侦察，尤其是对敌情、敌特的侦察，破获敌探，防止外部敌人的破坏，对付小股土匪。

保卫局上述任务对于一支在敌人围追堵截下进行战斗的革命军队来说，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当时，各

级保卫局有垂直的领导系统，其设置以及其工作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都仿照苏军模式，并不切合中国红军的实际，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而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只是由于罗瑞卿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调查研究的真功夫，才使一军团的保卫工作得以避免发生大的差错。这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罗瑞卿非常注重培养保卫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在向保卫干部讲课时，要求将新闻学中的六要素运用到侦察工作中去。他还把英文中的六要素改为“六何”，提出侦破每一案子都要弄清“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要求办案人员必须从事实出发。

例如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卫生部从国民党军队缴获了一大批药品，其中有一些包袋损坏，没有品名标签。有一些药品从外形看颇似奎宁，便当奎宁发了下去。军团部有两位干部正患疟疾，服了这种药，但这实际上不是奎宁而是吗啡，很快引起药物反应，病人乱抓自己的心窝，并在山上山下发疯似地乱跑。

事发后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敌人搞破坏，于是赶紧追查。第一个查到军团部的医生游胜华，他出身贫穷，

是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似乎不会。他开的药是上面发下来的，于是追到卫生部医务主任戴济民。戴外号叫戴胡子，原先在吉安开诊所，罗炳辉起义前在吉安当靖卫大队长时同戴相识，红军打下吉安后，罗炳辉动员他参加了红军。难道他是 AB 团 再往上追 追到了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由于他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参加红军的，所以被怀疑是故意破坏，姜本人也忐忑不安。

在聂荣臻参与下，罗瑞卿调查了此事，发现确实是发错了药 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聂荣臻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 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由于罗瑞卿工作成绩优良，1933年荣获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战争中的文体积极分子

罗瑞卿自幼喜爱文娱体育活动，到红军后，他仍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在红军中流行一种打克郎克球的游戏，有点类似南充老家的“赶臭牛”。他玩起来兴致颇浓。他最喜爱的踢足球，在红军中却难得踢一回，因为在南方山区，难得找到足球扬。有时碰到小学的操场或农民的打谷场，他的脚痒了，也要踢一踢，没有足球，就用篮球。怕踢远了，掉到沟里去，找不回来，便往高处踢。当时曾在保卫局当过侦察科长的谢滋群1986年回忆道：“他专门把球向空中踢，有时高达三四十米，他那时头发留得很长，披在肩上，踢球时头发忽地飘上去又忽地落下来……”大家都说：“罗局长的劲真大，球踢得真高！”他便乐呵呵地说：“来呀，踢呀，比赛呀，看谁踢得高呀！”

罗瑞卿不仅喜欢体育运动，而且爱好文艺，尤其是戏剧，参加红军以后他对此道仍不能忘怀。在红军攻打梅县途中，他还同人争论郁达夫小说的革命意义。他当

了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开始显露组织戏剧演出的热忱和才华。他一就任保卫局长，知人善任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立即委托他在保卫局里面开办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于是，歌声笑语便被引进了这个颇令人生畏的机关。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排戏，而罗瑞卿则是导演，有时还兼编剧。



红军战士剧社的一部分同志合影

罗瑞卿编写的第一个剧本叫《谁给我的痛苦》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有了剧本和导演，还要有演员。除了训练班的学员外，罗瑞卿还动员了不少机关干部上台。在分配角色

时，反派角色不大有人爱演，罗瑞卿便自告奋勇地演地主。他指着脸上的伤疤对大家说：“你们瞧，这颗该死的子弹，哪里不打，偏偏打在老子的嘴巴上。这就破了相了，但演个地主倒还凑合，我就演地主吧！”

由于这出戏对于发动群众打土豪有很大推动作用，以后它便成为保留节目。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一军团的演剧高潮出现于第四次反“围剿”的两大战斗之间。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了一部大型剧本，叫《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蒋介石反动统治就像春天庐山上的残雪，很快瓦解、消融。剧本中有许多角色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为了体现官兵同乐，罗瑞卿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都动员上台，各人按当时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又自告奋勇地扮演蒋介石，李卓然则扮演德国顾问赛克特。这么多的军团干部上了台，在部队内引起了轰动，部队的文娱活动也更为活跃了。

文化娱乐训练班除排戏外，还学习歌咏、墙报、游戏等知识。3个月后，训练班结业。在此基础上罗瑞卿又吸收了部分机关文艺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业余剧社。由于一军团的小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即起名为战士剧社，长征以后改为专业宣传队。它就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前身，罗瑞卿对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文工团曾演出话剧《南海长城》。罗瑞卿曾看过多遍并同演员座谈，对该剧从剧本到演出提了许多修改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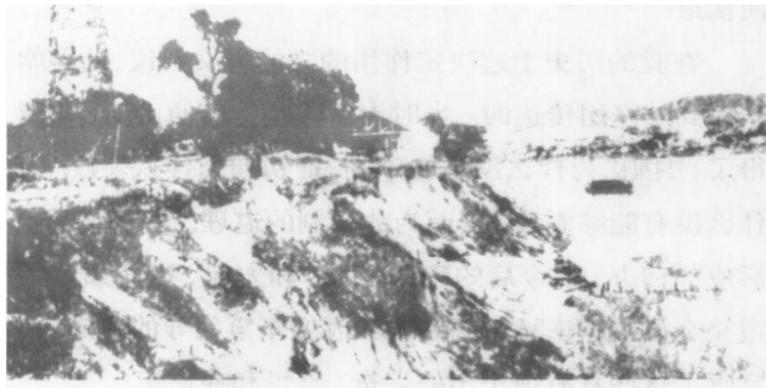
长征路上

1933年9月25日 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经过了约一年时间。在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战术的形势下 红军节节抗击，根据地日益缩小。罗瑞卿参加了红一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历次战斗，这些战斗中除初期在北线江西乌江地区消灭敌人一个师和后期在南线的福建温坊消灭敌人两个团是歼灭战外，整整一年打的都是消耗仗、被动仗。对于“左”倾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罗瑞卿已有感触。他在后来受林彪迫害，被“监护”时曾写道：

……他指李德的指挥总是黄昏出发 拂晓到达，有时机关枪、迫击炮放在哪个山头，他都要规定。明明一个晚上走不到的路，他硬要你走；明明打不胜的仗，他硬要你去打。听说他指挥凭的就是一支红蓝铅笔，一张地图，一把米达尺。所有这些，自己当时当然也有些感性知觉，主席没有管军事了，当然也看得出一些。但

是内幕情形究竟怎样，自己也搞不清楚……

就在罗瑞卿已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产生怀疑的情况下，1934年10月16日，他率领一军团保卫局随一军团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中，部队遭到重大伤亡。罗瑞卿除了行军外，还要用很大精力主持保卫局的日常工作，以保证部队和首长的安全。在过草地以前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德等随一军团行动，罗瑞卿要求做好对他们的外围警戒工作，保证绝对安全。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于都

1935年1月在路过贵州桐梓时他了解到有一股地主武装盘踞在一个叫做仙女洞的险要山洞内，便亲自仔细向群众调查，掌握了全部情况，然后指挥保卫队用喊话等办法迫使洞内的地主武装放下了武器，一举拿下山洞，不仅保障了部队行动的安全，还缴获了大批金银等贵重物资。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政治局会议，随后毛泽东到一军团作了传达。罗瑞卿听后非常兴奋，在回驻地的路上，他边走边对他的警卫员龙光和余波生说：“这下好了，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来主持军事，红军得救啦！”接着罗瑞卿便兴致勃勃地讲了毛泽东怎样领导秋收暴动，进军井冈山；怎样指挥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故事。对于这段历史，罗瑞卿后来回忆道：

在党的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党的遵义会议，是主席亲自到一军团传达的。当时大家听了主席的讲话，才懂得了“围剿”为什么没有粉碎，长征初期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没有能够制敌，反而为敌所制的道理；才懂得了今后应如何办，即今后的路线、方针和方向，也才知道了遵义会议重新恢复正确路线和改变军事领导的决定。大家听了这些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喜悦和痛快啊！

1935年2月在第二次打遵义时，保卫局和保卫队遭敌机轰炸。他回到宿营地时已经很晚了，但仍然详细了解部队伤亡情况，直到伤员都已安置、烈士都得到妥善处理，才去休息。

同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北上开路，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罗瑞卿协助刘、聂参与了强渡大渡河的指挥。一、四方面军会师分左右路军北上后，张国焘又反对北上方针，要南下逃跑。在班佑，罗瑞卿召集保卫局开会，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中央和军委指挥，坚决跟着党中央北上。

长征途中，尤其是翻越雪山之后，生活异常困难，全军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而罗瑞卿由于腮部负伤，嘴只能半张，吃饭十分缓慢，比大家吃得更少，经常饿肚。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加上年轻、有旺盛的生命力，终于从雪山、草地走了出来。

在长征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罗瑞卿对周围同志的命运、安全、健康十分关怀。

罗瑞卿有一位警卫员叫龙光，长征途中快到金沙江时，他的脚不慎被树枝刮破，又进水而感染，脚面肿得像发面馒头。但是他强忍着疼痛，尽量不在罗瑞卿面前

露出脚已受伤的痕迹。因为他知道，如果罗瑞卿知道自己脚有伤，就会让自己骑马，而罗瑞卿前几天得了感冒，还没有好……但是龙光再怎么掩饰，也没有瞒过罗瑞卿的眼睛。在罗瑞卿命令下，龙光被迫骑上了马，在马上，他如坐针毡，便又溜下马来。罗瑞卿生气地对他说：“你怎么搞的，叫你骑你就骑，不许胡来！”随后又亲自向医生要了一些盐，让龙光每天用盐水洗伤口。十几天后，龙光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了。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翻越过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

在长征路上，最艰苦的是爬雪山，过草地。过草地时，寒冷和饥饿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在草地，经常是阴雨连绵。罗瑞卿看到警卫员陈德先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便把自己唯一一条换洗的长裤给了小陈。小陈说：“你给了我 你就没法换洗了。”罗瑞卿说：“我有一条就行了 快穿上 不要冻死了。”同四方面军会合后，罗瑞卿领到一顶帐篷，很小，面积只比一张床稍大一点。每逢下雨或天气很冷时，罗瑞卿便招呼他的警卫员们都挤到里面睡觉。

在过草地前，虽然保卫局也准备了一些青稞麦，但进草地后，不见人烟，粮食很难得到补充。偶尔碰到一两户人家，主人因为听了反动宣传，早就跑掉了。房子里如果有粮食，罗瑞卿就让大家留几块钱和一张条子在屋内；屋内如果没有粮食，就只能到地里去收割尚未完全成熟的青稞。但因为老百姓都走光了，弄不清庄稼都是谁的，罗瑞卿便向大家解释道：“现在要保存红军力量，就必须要吃这些粮食。但钱又不知道该给谁，但我们又不能不吃，不吃就会饿死，这是没有办法才违反了群众纪律。那只有等革命胜利以后再来还这个帐了，到那时 要加倍偿还。”即便搞到一点粮食 但人多粥少 很快就又断粮了。一天，警卫员想给罗瑞卿准备点吃的，

但两手空空，急得直抹眼泪。罗瑞卿问明原因，便随手写了一个纸条给二师师长陈光，向他“借”几个饼子吃，然后让警卫员给送去。陈光看了纸条，不禁失笑，立即派人从伙房弄了8个大饼交给警卫员“借”来后，罗瑞卿便同大家分而食之。

在长征路上，伤病对人的生命威胁更大。有时伤病员走不动了就只好给几块钱，寄养在老乡家里。如果掉队，被敌人或不了解红军的少数民族搞走，那就只有死路一条。罗瑞卿对他的部属是能带走的尽量带走，他曾经救了好几位干部的生命。

在过草地时，侦察科长谢滋群不知什么原因，吐了很多血，身体虚弱，走不了路。有些同志建议将他寄养在老乡家里，罗瑞卿不同意，他说：“一定要把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随后亲自组织人抬担架。谢坐了几天担架，身体好转，罗瑞卿又拨给他一头骡子骑，终于顺利地出了草地。一师副特派员周贯五未过草地就腹泻。进草地别人背30斤粮食，他只背了8斤，然后省着吃，坚持到哈达铺。部队整编为陕甘支队后，周贯五任五团特派员，出发时病加重了，医生诊断是痢疾，不仅不能走路，而且骑马也坐不住。罗瑞卿知道后便派了一个班将周抬到医院，然后随医院一直到陕北。谢滋群、



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水草地

周贯五常对孩子们说，罗瑞卿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一、三军团在中共中央率领下越过草地北上，于9月下旬到达哈达铺后，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一军团编为一纵队，三军团编为二纵队，中央军委直属队编为三纵队。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直到10月下旬长征结束。

抗大教育长

1935年10月，罗瑞卿随中央红军到达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翌年2月，罗瑞卿作为第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参加了东征。东征回师陕北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罗瑞卿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教育长，一面工作，一面参加培训师以上干部（少数为团级的红大一科学习。1936年，西安事变后，



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

中共中央派罗瑞卿等随同周恩来赴西安搞统战工作。在西安，罗瑞卿先任周恩来的联络副官，随后被派往东北军，以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名义，向东北军政工人员介绍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的经验。这是罗瑞卿第一次接触统战工作。

1937年2月，罗瑞卿返回陕北，来到延安。此时，红军大学已随党中央迁至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傅钟，训练部长刘亚楼，教务部长杨立三，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校开设了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董必武等都曾为该校授课。

抗战爆发以后，大批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涌向延安，抗大吸收了一部分青年进校学习。教学重点逐渐由训练红军干部转向训练知识青年。转变学生的思想成为学校工作的目标，政治教育成为中心一环。1937

年8月1日抗大第3期开学，共吸收知识青年477人，到1938年4月16日，第4期开学时知识青年更猛增到4000人。面对抗大日益兴旺的局面，罗瑞卿高兴地说：“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1938年1月罗瑞卿任抗大副校长。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校舍便成了大难点，解决校舍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罗瑞卿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用挖窑洞的办法来解决。10月间他亲自扛着锄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来到凤凰山工地。经过半个月突击劳动，共挖成窑洞175孔，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

1938年，罗瑞卿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并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书的内容主要是向国民党抗日部队介绍红军政治工作经验。这本书共20万字，对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作了全面和详细的总结，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这本书除由延安的解放社出版发行外，邹韬奋等主持的生活书店也在国统区出版。写这本书同时表达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军队走向进步的满腔热情。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存有戒惧之心，这本书在国民党军队中



抗日军政大学校门

未能广泛流传。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中共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939年初春，罗瑞卿率领抗大千名师生上山开荒，至4月下旬，即完成每人开荒2~3亩的任务。同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随即，学校进行整编。抗大总校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以外，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

年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抗大 4 个大队改称第 1 至 4 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全纵队共有 5000 余人。

8 月初,纵队分为三个梯队由葭县达盘堂渡过黄河,到达兴县。随后,由第 120 师第 358 旅第 714 团和独立第 1 团护送东进,越吕梁山,涉汾河,再翻过云中山,到达同蒲路封锁线。9、10 月间,青年纵队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胜利完成东进的第一阶段任务。

在晋察冀经过 3 个月训练,抗大第 5 期毕业,13 个连队的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第 120 师工作,6 个连转到抗大二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 3 团调到冀中。余下人员于 1940 年 2 月 10 日从陈庄出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26 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地区,同由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挺进晋东南的任务。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径陕西、山西、河北 3 省约 30 个县,行程约 3000 里,通过同蒲、正太两道铁路封锁线,又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巧破日特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罗瑞卿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赴西安处理西安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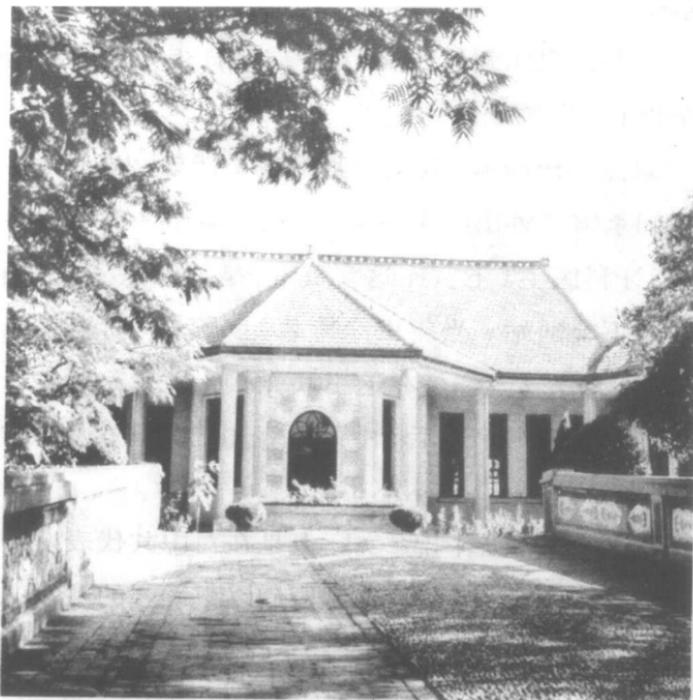
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罗瑞卿日夜为周副主席的安全担心，生怕敌人钻空子。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加紧了暗杀活动。国民党特务在夜间杀害了外出归来的温启同志。温启是奥地利共产党员、牙科医生。七贤庄这套院落是他的住宅，也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当年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以及林伯渠、丁玲等人，都是在这里和党接上关系，踏上了去延安的路。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大部分住在这里。

敌人杀害温启同志，实际上是在对中共代表发出警告。但是他们想错了，罗瑞卿他们以更顽强的斗争来回击敌人，他们布置了防范措施，同时加紧了对周副主席的保卫工作。

在张学良公馆附近，新开的一家牙科诊所引起了罗瑞卿的注意。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人突然开起诊所呢，而且又在这样一个并不繁荣的街道，会有几个病人？

他把这个疑点告诉了孙铭久，孙铭久立即派人调查，并监视其行踪。但调查者汇报说，开业的是个老医生，为生活计，早就要开诊所，由于整修门面而耽误了



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旧址

些时间，正巧赶在事变发生后开业。来往的也都是病人，没什么形迹可疑者。

罗瑞卿心里打了个问号。事情就这么简单？国民党特务、日本间谍，难道只知道在张公馆附近转来转去，不懂得设埋伏、安钉子？

他派一个同志去侦察，这位同志碰巧牙疼，进去治牙老医生确有技术，说得头头是道，只看了一次，把牙病治好了，似乎没有什么疑点。

罗瑞卿决定亲自访一访这位牙科医生，他换了便衣，把随行人员安排在附近，自己单枪匹马闯了进去。

“修牙吗 先生 请坐！”老医生见罗瑞卿进来，客气地打着招呼，请他坐到牙科专用椅上。

罗瑞卿点点头，一边就坐一边打量老医生。只见此人 50 岁上下，头发花白，有点秃顶，口音里有较浓厚的东北味道，在外表上确实找不到可疑之处。

“我这牙近几天有点疼，没大毛病，请瞧瞧。”罗瑞卿说着坐好。

“好的。”老医生熟练地拿起镊子，让他张开嘴，仔细检查起来。

罗瑞卿借机观察他的脸，他的皮肤白嫩，几道不深的皱纹里溢着微笑，眼睛里闪烁着探寻的光。

“先生，这是火牙。”老医生说，“牙床有些肿，可以上点药。”

“嗯，”他应着。

老医生上药很轻，也很准，看得出来，他是个牙科医生，不是冒牌货。

“好了。”老医生对他笑笑，然后去洗手。

罗瑞卿站了起来。

“坐一下。”老医生边揩手边说，“看看效果如何，不行的话，再上点药。”

罗瑞卿何尝想走，正好顺水推舟，坐了下来。“听口音，你是东北人吧？”他问。

“是呀，住在沈阳，唉，提起往事，不堪回首啊！”老医生对着镜子整理掉到额前的几根长发。

“日本鬼子可恨！”罗瑞卿突然愤恨地说，“太可恶！”

老医生身子抖了一下，随即镇定下来，转过身来说：“是的，占了我的家乡，这个仇一辈子忘不了的！”

罗瑞卿站起来，观赏墙上的字画，这是孙思邈的一段医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这字写得真好！”罗瑞卿赞赏说。

“唔，不错不错。”老医生附和着。

“请问这位姓孙的，是哪朝哪代的医生？”

他漫不经心地问。

“秦代大医学家，对中药最有研究。”老医生若有所思地说，眼神有点张慌。

“他是浙江人吧？”罗瑞卿又问。

“陕西的，韩城有他的墓地呢！”这次，他答得比较肯定。

罗瑞卿又坐了一会儿，付了钱，表示谢意后，出来了。当晚，他就让孙铭久下逮捕令。

孙铭久对他的自信大为惊奇：“你为什么抓他？”

“他是日本人。”罗瑞卿毫不含糊地说。

“日本人？”

“对了，他说，是的，这个仇，一辈子忘不了的，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话。”

“只凭这一句——”

“还有，在给我检查牙时，他不自觉地轻声自语：‘扣类’，这是日本话‘这里’的意思。”

“还有吗？”

“有。”

“请讲。”

“他说孙思邈是秦朝人 实际上 应该是唐朝人。”

“罗将军 有你的 要是我 他说秦朝的 我也会信呢！”

“还有。”

“嗯？”

“孙思邈是耀县人 他却说是韩城人 看来他是临时抱佛脚 背都背错了。”

“真有你的！”

“总之，”罗瑞卿总结似地说，“他是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特务。”

老医生被逮捕了。经过审讯，他供认不讳，是在东北长大的日本人，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潜伏到北平。西安事变后，又奉命前来西安，专门设法搜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活动情况。他起初说没有电台，后又说已经毁了。但是经过两次仔细搜查，终于在挂字画的地方发现暗门，找到了电台和秘写工具。

拔掉了这个钉子，罗瑞卿心中稍微安稳了一些。

在西安期间，罗瑞卿协助周恩来等人，为贯彻中央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打开了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野战政治部主任

1940年6月16日，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其时朱德已回延安，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由彭德怀主持，参谋长是左权。

罗瑞卿到任不久就赶上了百团大战。这是罗瑞卿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听说自己的部队有100个团一起作战。他万分兴奋，情绪高涨地布置整个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并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四处联络、督促、检查。在战役快结束时，他还参与了彭德怀亲自指挥的129师围攻关家垸高地之敌的战斗。

当时不仅是罗瑞卿，从中共中央领导人到全国人民都为百团大战的辉煌战果感到振奋和鼓舞。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根据地指出：“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

面去... …”9月20日延安各界群众1万余人隆重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洛甫、王稼祥、陈云等均出席了会议。

9月25日，罗瑞卿主持野战政治部对百团大战作了政治工作总结，指出：大规模交通战是抗战相持阶段的重要作战手段，事先必须进行周密的准备同时极端严格地保守秘密。在破路、打援和必然要随之而来的反敌人报复性的大烧大杀的“扫荡”中，必须发挥战时政治工作在攻坚和守备中的顽强性。1941年1月他又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一文进一步指出：“我军战斗力顽强性的具体标准就是要能够同敌人胸接胸地进行白刃的扑搏。”战斗中的白刃扑搏才是我军战斗意志的最高表现。”我军的政治工作就要能保证部队此种战斗力之顽强性的养成……”

经过三个月的英勇战斗，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歼灭日军和伪军各2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使正太路中断一个多月。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敌人，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逆流起了积极作用。

在百团大战开始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八路军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一些旅。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成立巡视团，帮助新部队进行整顿。罗瑞卿负责组织，他任命组织部长周桓为巡视团团长，总部作战处长阎揆要



1940年10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右二）同八路军第386旅旅长陈赓（右三）等在关家垴战斗前沿阵地

为副团长。巡视团下设军事、政治两个研究室和一个负责训练营连干部的军事教导营。此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一部电台，共300余人。

在巡视团出发之前，罗瑞卿召集他们开会，提出，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罗瑞卿要求巡视团注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发现问题要用商量的办法解决。巡视团下去之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等军区和115师教三旅、教四旅的连队，一面参加破路斗争，一面帮助连队工作。教导营共培训5期，训练了约1500名连队干部。

由于敌人封锁平汉路，巡视团遇到一般问题都是就地解决，涉及重大问题则电报请示总部。至于回总部请示汇报，两年多时间内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41年的二三月间，解决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的关系问题。巡视团发现冀南把大部游击队都编进了主力，因而群众游击战开展不起来，群众不能及时得到游击队的掩护，主力军也得不到游击队的配合。周桓等将这一情况向总部报告，彭德怀、罗瑞卿乃指示周桓等同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司令员陈再道等一同到总部汇报工作。彭德怀、罗瑞卿和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取了汇报，纠正了将游击队全部编入主力的倾向。

第二次是在同年9月，巡视团发现有些地方执行锄奸政策过左，把不是汉奸的人也当汉奸抓了，影响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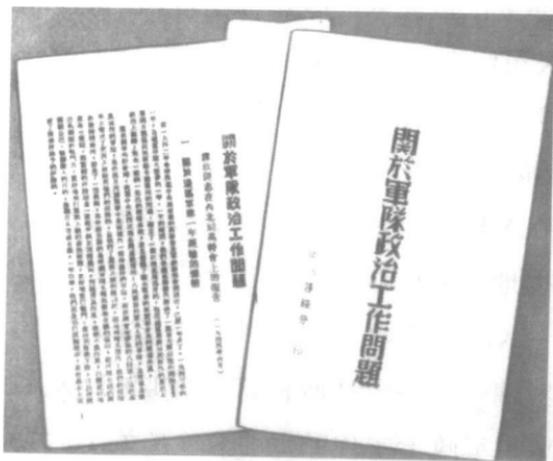
众的发动，在回总部汇报后，解决了正确执行好政策的问题。巡视团在各地工作时同当地部队一道反“扫荡”，一道参加百团大战，同当地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不少同志英勇牺牲。去冀中军区工作的30人到冀中后正赶上“五一”大“扫荡”，20余人牺牲，其中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太。1942年9月巡视团工作结束，大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工作，团长周桓带了少数干部返回总部。除派巡视团外，罗瑞卿还带人到驻太行、太岳地区的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

当时，由于敌伪封锁，交通困难，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于华北各根据地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多的是通过电报和编发《八路军军政杂志》，交流各部队经验，进行业务指导。罗瑞卿主持野战政治部工作期间，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在宣教会议上的总结》、《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敌伪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等文章。内容涉及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干部工作、群众工作、敌伪工作、连队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作风等各方面，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国民党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罗瑞卿强调抗日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坚持我军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又要发挥创造性。

1940年10月他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



政治工作报告中专门阐述了这一问题，指出：保持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根据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内容则表现为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军队战斗力的源泉；坚持实行政治工作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任务；坚持我军组织上的阶级性和纯洁性，坚持优良的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发扬政治工作创造性的根据则是由抗日战争和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而形成的不同于内战时期的新的情况和特点。战争的新阶段必须有政治工作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不能不顾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抄袭内战时期的一切方针和方法。

罗瑞卿在《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新的一年与新的政治任务》、《在宣教会议上的总结》等文中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政治工作创造性的问题。他认为，要发扬政治工作的创造性，必须将实际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从实际出发，才不会墨守成规。

他认为，干部工作的出发点是正确地认识干部。他说：“要真正认清一个干部，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的应当客观的全面的看问题，不要主观的片面的看问题，应当历史的发展的看问题，不要固定的一时的看问题。对于好的干部，要看到他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弱点的一面；对于比较差的干部，不要仅看到他差的一面，还要看到他有无好的一面。十全十美的干部事实上是没有的。不仅要看到干部的去，而且要看到他的现在；也不要看到干部的现在，而且要看到他的过去。不能凭一时的好坏作结论，不能凭个人之好恶作结论，目的在于真正发现人才，而不致埋没人才……”他指出，

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正确地认识干部，正是为了达到“任人唯贤”的目的。

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他认为，干部教育进行的全过程——原则、计划、内容、教材、教法等等，都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教育工作领导上的主观主义与学习上的教条主义。在战士教育上必须从抗战期间战士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文化水平很低，战斗频繁、斗争残酷、流动性大等实际情况出发，“主要目的是在于巩固政治情绪，确立胜利信心，坚强斗争意志，以提高部队战斗力”。

在瓦解敌军工作上，他提出，知己知彼是对敌斗争的出发点，必须加强敌占区的情报工作，不仅了解敌伪的军事情况，还要了解敌伪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不仅要了解敌人，而且要了解敌占区人民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敌伪和人民群众之间、日军和伪军之间、死心塌地的汉奸和动摇分子之间、一般伪组织与会道门伪组织之间、会道门头子和会道门群众之间的矛盾，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争取中间分子，打击最坏分子。

在锄奸保卫工作上，他认为，侦察部门是锄奸部门的灵魂。“对于任何反革命的破坏，都必须有确切的



山东渤海部队对被俘日军讲解宽待俘虏政策

证据(人证、物证、事证)决不能把工作的希望寄托在犯人的口供上面。以刑讯逼供的办法，更必须绝对禁止。”

罗瑞卿不仅撰文从各个方面说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时时注意纠正主观主义的坏作风。对于组织、宣传、敌工等部门的重要工作，他还亲自去抓。野战政治部设有一个实验京剧团，罗瑞卿对这个剧团的工作抓得很紧。在文艺演出方面比

实验京剧团更加有名的是抗大总校文工团，它成立于1938年12月，其成员调来之前都经过罗瑞卿亲自了解挑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建国后仍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著名导演欧阳山尊，《解放军进行曲》的曲作者、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 影片《中华儿女》的剧作者颜一烟 京剧改革的实践家、《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史若虚 著名电影导演吕班都先后是这个文工团的成员。

罗瑞卿对文工团非常关心，平均每两周即要到文工团去看看，或将文工团领导请去汇报工作，了解情况，进行指导。他要求文工团要配合学校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战争，以此进行创作和演出，以活跃学校文化生活。文工团作为政治工作的助手，要会做群众工作 会宣传鼓动 会写标语。要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文工团的团风。

文工团随抗大东移过同蒲路到达晋察冀根据地，罗瑞卿联想起红军过金沙江后，国民党追兵在江南只拣到几只破草鞋的故事 对大家说：“这是一次小长征，日本兵什么也没有捞到 在同蒲路上只拣到一只破草鞋。”于是 金沙、吕班便编了一个独幕剧《破草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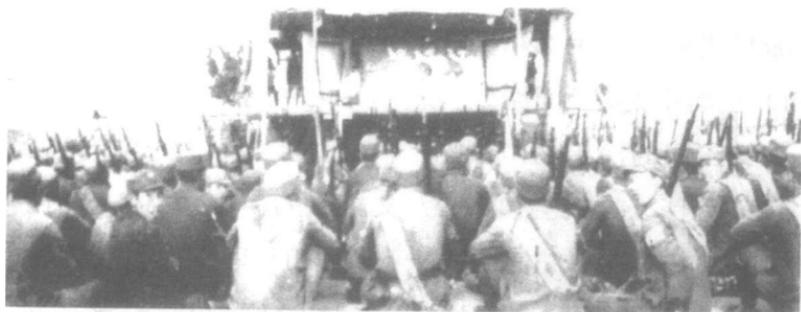
为庆祝 120师的陈庄大捷，文工团创作了京剧《战陈庄》到 120师和晋察冀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到太行地

区后，在蟠龙镇，文工团还和鲁艺实验剧团联合排演了《黄河大合唱》此外还演过话剧《雷雨》和京剧《打渔杀家》。

皖南事变以后还编演了京剧《亡宋鉴》叙述了主战派岳飞被秦桧用 12 道金牌召回，被害于风波亭的故事，以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残害新四军的暴行。在太行山，抗大文工团的演出名声最响，举凡慰问部队、重要节日或边区有什么重大会议，抗大文工团的演出是必备节目。一有演出，老乡们便一传十，十传百，早早便把演出场地坐得满坑满谷。在桐峪 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没有五盏汽灯的戏不看 抗大有五盏汽灯）没有咬牙的讲话不听。”（罗瑞卿脸部负伤后说话总给人以咬着牙的感觉）抗大文工团的演出和罗瑞卿的演讲应当说是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节目。

在八路军总部，罗瑞卿无论是参加政治学习、助民劳动 还是出早操 都从自己做起 率先垂范。1941 年，机关开展练兵活动，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天还不亮，各部便从四面八方清漳河边的一个中学的大操场集合出操。罗瑞卿和参谋长左权经常是最先来到操场，打绑腿、扎腰带、佩带手枪 军容整齐。罗瑞卿一到操场便问带操的同志，今天站队是大个子在前还是小个子在前，

他爽朗地说：“如果大个子在前 那我就是排头 如果小个子在前 那我就是排尾。”如果有事不能出操 他必定要向带操的同志请假。



战士们观看文艺演出

罗瑞卿因面部伤残，平时很少露出笑容，加之在工作中对部属要求严格，许多干部刚见他时都有点怕他，但时间久了便感到他待人赤诚，且十分平易近人。在太行山，他仍热爱体育。山区见不到足球场，足球踢不成了 他便转而爱打排球。由于他个子高 打9人制排球，他总是站在前排中，既可扣球，又可拦网。他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打球 同志们便亲切地称他为“球掌柜”。当时，八路军正针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政治攻势。由于罗瑞卿扣的球攻击性很强，而他又是政治部主任 人们又叫他“政治攻敌师 师长”。

有时，罗瑞卿也会同大家开玩笑。一次，野战政治部机关在学唱一首苏联歌曲，教唱的是一位河南籍的女同志。这首歌中有两句歌词是“悦耳很动听，使人听不厌”这位女同志用河南口音唱听起来像是“死人听不见”。罗瑞卿便打趣说：“你这两句是啥子意思啊？‘死人’就是听不见嘛！”他的话引得轰堂大笑，但罗瑞卿却绷着个脸，一本正经。

爱情

1940年5月，罗瑞卿被中央任命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这一时期，罗瑞卿是工作和爱情双丰收。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一个叫郝治平的青年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这段爱情故事，是耐人寻味的。

1940年底郝治平来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党校每天晚饭后有一个多钟点的自由活动时间，在延安读抗大时的萧彬跑来找她，邀请郝治平去见她的爱人。三人刚坐下，罗瑞卿笑吟吟地进来了。因为是过去的老上级，郝治平给他敬礼，握手，随意谈谈，便起身告辞了。

第二天，课间休息时郝治平收到一封信，她瞧瞧信封上陌生的笔迹，漠然地往笔记本中一夹，走进课堂，继续专心听讲。是啊，她猜到信中的内容，像这样的信，她收到的太多了。

战争再残酷也压不住人类崇高的情感。

回到窑洞，郝治平拆开信，一看信开头的称谓“紫

萍”心里纳闷 她原名叫郝治平 后改为赤茜 从没叫紫萍啊 她急忙翻到最后一页 落款是三个字“洛水清”，一阵慌乱攫住了她的心。姑娘的心跳了 这“洛水清”是谁呀，怎么谈情说爱还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干吗化名呢？细细一琢磨，她明白“洛水清”不是别人 肯定是罗瑞卿，“洛水清”是罗瑞卿的谐音嘛。

对罗瑞卿，郝治平并不陌生。在延安抗大时，罗副校长经常给她们讲课。其中赢得满场掌声名句“抗大抗大 愈抗愈大”连同会场内滚动的春雷，一齐留在她的记忆中。

郝治平那晚把“洛水清”的信反复读了几遍，突然又为自己方才的慌乱害羞。人家是老红军老首长，见到老部下、年轻干部，约去卿卿天何必神经过敏呢。

第三天晚饭后，郝治平独自向村头走去。村口大柳树下 果然站着个高大的身影 见她出村 迎过来 两人并排沿着乡间小路，缓缓走着。

不知为啥，一向落落大方的郝治平心跳加快了。这是她第一次单独和罗瑞卿在一起，有些拘谨，不知谈话怎么开场。

罗瑞卿翻开一个本子递过来：“还记得这照片吗？”郝治平凑近一看：“怎么不记得 这是您离开抗大时给我

们女生队拍的嘛！”她仿佛为了克服内心的拘束和紧张，开始顺题说起照片上同志们的去向和近况，说话又快又流利，罗瑞卿多是点头，专注地听。

两人又转到村口 罗瑞卿站住了：“好了 我不进村了 我是四川人 爱吃辣子讲实话。我腮部负伤后 讲话有点费力 心里想的事 还是用笔写顺当些 我给你写信 同意吗？”

郝治平冲口而出：“我写信可写不好。”

罗瑞卿握住郝治平的手，笑着打起趣来：“我们订个君子协定 我有事就给你写信 发挥我的长处 你学习紧 不必回信，只要晚饭后出来 我们见见面 我听你



1961年，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在北京

讲，发挥你的口才，这样大家都便利、舒心，你看如何？后天是星期日 我再来等你 好不好？”

郝治平抽回手，不置可否地笑笑，笑得有些勉强，有些不自然。往回走时，郝治平心里乱纷纷的，罗瑞卿没明讲继续交往的目的，可目的只有傻瓜才猜不出。

“洛水清”的信来得很勤 郝治平读这些信 常感到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信中除了继续称她紫萍外，没提到过一个亲昵的字眼。他谈对战局的分析；对党史学习的理解；对学员中的疑问的解答。郝治平每次读他的信，都感到有收益，并能从字里行间品味出罗瑞卿对自己的关心和思念。他的文笔流畅，条理清晰，以理服人。

一次月下 罗瑞卿送郝治平往回走 他突然说：“治平，你这个人好骄傲哟！”

郝治平有点意外“我怎么骄傲啦？人家都说我挺谦虚的。”

“你忘了 我们第一次在黄河边见面 你都不理我。”

郝治平想起来了。1939年，抗大行军到了黄河边，黄河涨水，他们驻在一个小村子，等候水退渡河。一天罗副校长到驻地看望大家，郝治平大方平静地给副校长敬个礼，问了声好。当大家都围过来向副校长问长问短时，她已闪开位置，悄然离去了。

郝治平不以为然：“你是副校长，我只是个技术书记，我能向你说啥！”

“你恐怕是嫌我长得黑，没相中吧！”罗瑞卿开起玩笑来，“你别看不中我，你知道吗？有次我出门回来，桌上放了一束盛开的野花，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呢。”

“噢？！那你去找给你鲜花的姑娘好喽，我不理睬你，你为什么找不理睬你的人呢？”郝治平顽皮地以攻为守。

罗瑞卿没有立即回答，他凝视着郝治平的眼睛，半晌才轻声说：“我就喜欢对我不理不睬的姑娘。”接着，他一手扶着她的肩，缓缓往前走着，一边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家庭，坦率、真诚地叙述了自己过去婚姻的曲折和痛苦。

郝治平惊呆了，她真没想到，平日乐观爽朗、朝气蓬勃的罗瑞卿，个人生活中竟有着这样痛苦的记忆。她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担心自己年轻、无阅历、无能力安抚面前这位成熟领导者久经沧桑、倍受痛苦的心。她咬着嘴唇，什么话也说不出。

“你为什么不说话？”罗瑞卿发觉郝治平身上在发抖，他放下自己的胳膊，有些难过地问：“是因为我从前结过婚？”

“不！”郝治平抬起头，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在意你过去爱过谁，我只想证实你现在是不是真爱我，需要我。我担心我挑不起作为你爱人应该挑起的担子，担心我太幼稚，不能给你增添慰藉和爱护，担心……”郝治平几乎呜咽出声。不清楚罗瑞卿的过去时，她爱他的坚毅、爽朗和平等；知道了他过去的曲折，她更爱他的诚实和坦率。这时她只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出世，让自己成熟丰富的感情，安慰面前这位她深深爱着的人。

罗瑞卿眼睛里闪动着一束奇异的光彩，他无法压抑心头幸福的冲动，把郝治平紧紧拥抱在胸前，他声音发颤，近似喃喃细语：“好姑娘，谢谢你，我就盼望有个纯洁、真诚而又坚强的姑娘真心地爱我，能与我结为终身伴侣，共享幸福，共度忧患，你的淡漠，你的单纯，你的善良，你的坚韧，都是我期望的纯洁、真诚。嫁给我吧，治平，我爱你，我真心地爱你！”

郝治平幸福地流泪了，她不愿让罗瑞卿笑话她的软弱，只伏在他的胸前微微点点头，小声说：“瑞卿，等我党校毕业再结婚，好吗？”

“几号毕业？”

“4月3日。”

“行，4月3日结婚，我一天也不愿多等！”

1941年4月3日罗瑞卿同郝治平在桐峪镇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1975年春罗瑞卿写了《忆往事书赠郝治平》。他写道：“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结婚……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情真心挚。”本年4月3日为我们结婚三十四周年，时光易逝，好景却长。我们之间时日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厚。”这些话表达了罗瑞卿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和对郝治平的深情。

在“谈”和“打”两条战线上

抗战胜利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年9月9日，有一架美国飞机从延安飞往晋察冀，罗瑞卿和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等便搭乘这架飞机于当日在灵丘县降落。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耿飏乘汽车从张家口赶来迎接。



1945年，罗瑞卿（右四）与贺龙（左一）、聂荣臻（右二）在绥远合影

聂荣臻、罗瑞卿一行随即换乘汽车于薄暮时分到达张家口东山坡原日本蒙疆派遣军司令部。这里西面距火车站约有一公里，东面是光秃秃的山，山脚下有一些树木，设有日本神社。神社东面是颇为整齐的一栋栋红瓦顶、推拉门、大窗台的日本式平房。晋察冀军区机关即设于此，罗瑞卿住进了其中的一栋房屋。

罗瑞卿到张家口不久，便同聂荣臻、萧克、耿飚等率领3个纵队赴绥远，同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委李井泉会合，与晋绥部队共同组织了绥远战役。晋察冀部队攻克了丰镇、集宁，晋绥部队攻克了卓资山。傅作义迅速将其主力集中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因晋察冀和晋绥部队未在野战中大量歼敌，加上无攻城经验，因此攻归绥、包头均未奏效。就在晋察冀部队向归绥开进过程中，罗瑞卿奉命先返回张家口，到怀来地区组织对东面北平方向敌军的防御。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了控制热河，11

月 9 日，中共中央任命罗瑞卿为冀热辽军区第二政委。罗瑞卿和司令员萧克一道，随即经密云、古北口，到达承德，与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会合。在承德，罗瑞卿和萧克组织了过境部队和大批干部赴东北。

年初 国共双方的停战令即将下达。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到处抢占战略要地。 月 日 国民党军第 军、第 军各一部猛攻古北口，罗瑞卿奉命率领冀察纵队沿平古线西侧由四海向密云方向运动，迂回国民党军之侧后。敌军在古北口遭到冀晋纵队第一旅和冀东 分区部队坚决阻击、被歼 人后 又发现后路将被阻断，乃南撤回石匣固守。

年 月 日 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 日，也就是罗瑞卿率领冀察纵队从承德驰援古北口的那一天，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受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设立三委员，即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郑介民和美方的饶伯森。三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和六个业务处。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

方面的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的参谋长是海斯克。中共方面除叶、罗外，还有顾问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秘书长是李克农。罗瑞卿由前线返回承德后不几天，1月14日，耿飏乘飞机到承德，将他接到北平履行新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方便，中央军委特别任命了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人员以军衔：叶剑英、罗瑞卿、滕代远、饶漱石为中将。

国民党方面虽然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又坚持将东北除外，并进一步调动军队，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同时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罗瑞卿等人的任务便是用谈判桌上的斗争，配合战场上的斗争。由于国共双方立场尖锐对立，执行军调部的任务便离不开吵架，而美方则袒护国民党，拉偏架。罗瑞卿曾回忆说：“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吵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往哪些地区派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希望将小组派往国民党集结重兵的地区和准备进攻的地区，以便制止其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反对。反之，国民党希望将小组派往共产党在军事上占居有利形势的地区，中共方面则表示反对。

二是交通问题，国民党方面为了加紧运兵打内战，



1946年,罗瑞卿(后排左四)、叶剑英(后排左八)、贺龙(后排左五)与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人员在北平颐和园合影。

主张立即恢复交通，而中共方面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

三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然后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赴当地进行调查。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共派出了36个执行小组，地域北达吉林，南至广州。他们把在北平的“吵架”扩展到了全国各地。这些小组如果派到解放区，国民党的成员便千方百计搜集

情报。如果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即组织一些地痞流氓还乡团对共产党成员“请愿”进行挑衅，有时甚至扭打中共方面的人员。于是，中共方面即据理抗议，而国民党方面则推诿抵赖，最后则不了了之。

1946年2月20日，在北平就发生了由土豪劣绅组成的“河北难民返乡请愿团”1000余人冲进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总部中共办公室捣毁玻璃门窗、桌椅板凳的事件。罗瑞卿立即召集记者招待会，义正辞严地抗议国民党纵容特务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暴行。对这些争吵，罗瑞卿回忆道：“他们诬蔑我们违反停战协定，我们据理驳斥反击。我们如实抗议他们违反停战协定，他们蛮横狡辩、抵赖。他一篇，我一篇，美国人一篇，都是针锋相对，越吵双方距离越远。美国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偏袒国民党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问题上装作公正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上当。开会，吵，再开会，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复去，周而复始，没有终了。”

这种“争吵”留下了许多唇枪舌剑的记录，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开会，罗瑞卿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说罗这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方参谋长海斯克莫明其妙，蔡便向海斯克解释：

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一些偏旁部首有特定的含义。狡字是反犬旁，狗的意思，罗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翻译为翻这个英文中没有的“偏旁部首”吭哧了好一会儿，最后翻成了“构成文字的部件”。海斯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蔡的话的意思，然后耸耸肩膀说：“你们的中国字实在是神奇莫测。”然后要求罗略表歉意。罗听了蔡自动对号入座的解释，心中暗笑，但仍拒不道歉。海斯克又转而对蔡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还是接着开会。蔡又不干，于是休会。以后因美方坚决要求，又无条件复会，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在军调部除了吵架外，还有出席鸡尾酒会之类的应酬。这种场合虽然用不着吵架，可罗瑞卿不胜其烦，仍视为苦事。他渴望到战场上去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陆续把军队从后方向内战前线运送，并从2月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大举进攻，在关内向各解放区频繁骚扰，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全面内战的阴影越来越浓，国民党在北平等地对中共人员的磨擦也日益加剧。

4月3日凌晨3时许，中共《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驻地宣武门外方壶斋21号、《解放》报的发行

处西四三道栅栏 41 号、第 18 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筹备处驻地西城区前京畿道 12 号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住于此地，此地亦称滕公馆）几乎同时遭到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搜查，借口是查户口和查违禁物品。《解放》报社负责人钱俊瑞等数十人被捕，其中张鸿烈被抓上警车时，手指被车门挤伤，住进了医院。

叶剑英凌晨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罗瑞卿、滕代远、李克农等紧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由叶剑英起草致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方面委员郑介民的备忘录和给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 11 战区长官孙连仲和北平市长熊斌的电报，将这些文电公布于世，同时迫使饶伯森、郑介民也采取行动。滕代远召集记者招待会并去找李宗仁、孙连仲、熊斌提出抗议；罗瑞卿和宋时轮到北平市公安局要他们道歉、放人。

4 月 4 日，罗瑞卿和宋时轮首先去医院慰问了张鸿烈，然后驱车来到公安局，慰问被捕者，并让警察去把局长陈焯叫出来予以严厉训斥。在旧中国，警察要比军队小三辈儿，陈焯这个局长在这两位佩戴军衔的将军面前不得不承认有错。不一会儿，叶剑英、滕代远又迫使熊斌和他们一道来到公安局，要熊命令陈焯道歉、放人。随后被释放的全体人员乘坐卡车，沿途高呼“反

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等口号，胜利回到军调处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

4月上旬，针对国民党大举运兵到东北并于4月2日占领海城、鞍山、营口，4日占领昌图、法库并准备大举进攻四平形势，周恩来同美方代表吉伦（在马歇尔回国述职期间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陈诚接替张治中反复会谈，要求在东北停火，并去东北视察。陈诚认为东北原无共军，停战令不适应于东北，不同意停火。他虽对去东北视察无异议，但又表示自己无暇去东北。

4月12日根据三方协议，三人小组赴东北。但是真正三人小组成员一个也没有去。代表马歇尔的是吉伦，代表陈诚的是秦德纯，代表周恩来的是陈士榘。三人小组要求三方委员同去。美方委员饶伯森去了，郑介民因忙于处理戴笠飞机失事后戴的丧事并接替戴中统局长的职务而派了一名代理人，罗瑞卿则代表叶剑英。

三人小组到达沈阳后住在太和旅馆。在沈阳，东北三人小组中共代表饶漱石提出：（一）停止冲突；（二）停止运兵到东北；（三）国民党军退出3月27日后所占地区。然后三人小组代表各作一次发言，执行部三方人员亦各作一次发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或针锋相对，或不着边际，什么问题也未解决。

在沈阳只待了一天，罗瑞卿便和陈士榘同机返回北平。由于美国飞行员对中国的地形地貌不熟悉，航行偏离到张家口，在山沟里转来转去，找不到机场降落。罗瑞卿在飞机上用他那有限的英语连说带比划地告诉飞行员偏离了航线。飞机在大同机场降落，然后才飞到北平。回到驻地后，罗瑞卿把在飞机上的惊险遭遇说给李克农听，当时飞机失事频繁，李克农颇为罗瑞卿等平安回到北平而庆幸。



三人小组成员周恩来（右一）、马歇尔（右二）、张治中（右三）

4月16日罗瑞卿、陈士榘应周恩来之召，飞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沈阳之行的情况。在重庆，罗瑞卿参加了“四八”烈士追悼会，然后又飞到延安向毛泽东报告工作。当罗瑞卿汇报到在军调部三方开会尽是吵架，国民党代表不讲道理时毛泽东说：“什么叫道理 你想要讲的话就是道理。他们不讲道理 我们讲道理。”听毛泽东这么说，罗瑞卿便把他同蔡文治关于“狡辩”的争论说了一遍，毛泽东听后大笑。当罗瑞卿汇报到军调处有些同志担心做不好工作，怕影响全局时，毛泽东鼓励说：“你们尽可放手工作 影响不影响全局 不在军调部。”对今后工作，毛泽东指示，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国民党的假报告，要坚决顶回去。听了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进一步提高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当罗瑞卿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郝治平带着大女儿峪田从张家口搭美国飞机到北平。她在来之前学了半年英语，准备到军调部工作。李克农把她接到翠明庄，她们一进门便看见照壁上有一张蒋介石身着戎装的半身像。刚刚5岁的小峪田立即指着说：“大坏蛋！”郝治平知道，此地到处是国民党特务，怕惹出麻烦，忙将她抱起来，对她摇摇头。李克农给郝治平安安排好住处，对她说：“有电报 老罗今晚就回来。”

但是，当天罗瑞卿并未回来。吃过晚饭后，李克农见郝治平站在阳台上朝长安街方向眺望，便走过来安慰郝治平说：“治平同志 筹急了吧？”郝治平何尝不急，但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其实，此时的李克农也很着急。一个月两架飞机失事，一架上面是戴笠，一架上面是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震动了全国、全世界。他知道郝治平也会往这上面想，他还没有告诉她上次罗瑞卿从沈阳回来飞机迷航的事，他怕她听后会更着急了。于是，他只是说：“不用担心，罗政委不会出什么事，可能有什么事耽搁了。天凉了，进屋休息吧！”

这一夜，郝治平彻夜无眠。第二天，罗瑞卿从延安回来，她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罗瑞卿看到妻子十分高兴，当郝谈起她一夜未睡时，罗瑞卿说起上次从沈阳回来迷航的事，郝治平还真有点后怕。

郝治平到北平后，感到在军调部工作环境完全不同于在解放区，自己不一定能适应。罗瑞卿告诉她，蒋介石在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军调部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于是，郝治平决定住几天后即返回张家口。

转战歼敌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派遣3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罗瑞卿奉中央之命，返回了晋察冀解放区。他一到晋察冀军区指挥部，就迅速了解敌情，指挥作战。同年7月至9月，他参加指挥了大同、集宁战役；10月，他参加指挥了张家口保卫战；1947年初，又参加指挥了易涑、满城、保南战役和正太战役，几乎是无日不战。在这期间，罗瑞卿还领导部队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到了1947年6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已经被粉碎，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全国各地的解放军部队不断地打歼灭战，整师、整军的敌人接二连三被消灭。在这种形势下，罗瑞卿认为，前一阶段的作战虽然消灭了不少敌人，但还没有打出大量歼敌的歼灭战。要想完全掌握主动，就得痛痛快快地打掉敌人几个师、几个军。

于是，罗瑞卿率部东进，来到津浦路以东的渤海区寻求战机。

从6月中旬到10月中旬，晋察冀野战军先后进行了青县、唐官屯战役，保北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虽然歼敌近2万人，但仍未能实现打大的歼灭战的意图。对此，罗瑞卿很不满意。

时间已是金秋，全国各大战场不断传来大量歼敌的捷报。罗瑞卿一向是不甘落后的，面对兄弟部队的辉煌战绩，他更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此时的他，满脑子都是捕捉战机的念头。

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我东北野战军发动的秋季攻势，使东北战场敌军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从晋察冀战场上抽调了5个师出关增援。罗瑞卿根据敌人兵力相对空虚这一情况，与杨得志、杨成武等人果断地决定，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炮兵旅等部队，再次杀向保定以北地区，先消灭徐水之敌94军。

10月11日，进攻徐水的战斗打响了。我军各部迅速扫清了徐水外围的敌人据点，随后向徐水守敌发动猛攻。守敌第94军共辖5个师在我军的进攻面前他们迅速收缩防线，5个师猬集一团拼死顽抗。我军猛攻6个昼夜，未能攻下徐水。鉴于这种情况，罗瑞卿等指挥员决定改变战术，分兵西进，以引诱敌人从坚固的城防



1947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成立时，罗瑞卿同杨得志等在一起。左起 潘自力、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工事中出来，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正在此时，蒋介石飞到北平。他一下飞机，便指手画脚地训斥部下作战不利。蒋介石判断：我晋察冀野战军围攻徐水6天未能攻克之后，已经大伤元气，主力西窜以便休整，现在进攻徐水只是掩护主力的撤退。于是，他命令驻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部赶奔保定以北与徐水的94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我晋察冀野战军主力。

罗历戎不敢怠慢，果然率全军倾巢出动，浩浩荡荡杀奔保北而来。

战争即是斗智斗勇。应该说蒋介石并不笨，他的这一着也可谓杀机凶险。但是，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了，他不知不觉地让我军牵着鼻子走，未曾交锋，已先失一着。

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飏等野战军首长得知罗历戎出动，真是喜出望外。他们已经看到，半年多来苦心捕捉的战机就在眼前。于是，指挥部立即作出相应部署：一方面命第二纵队一部、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伪装成主力，继续攻打徐水，并准备抗击从北面而来的敌人援军；另以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和当地民兵，纠缠住敌第三军，既要■制和迟滞它的前进速度，又要准备阻止其后撤；野战军主力6个旅，星夜秘密南下，围歼敌罗历戎部第三军。

我南下部队连夜向清风店急进。部队一边急行军一边作战前紧急动员。战士们士气高昂，脚下生风，一夜行军100多里。太阳升起来时，部队进入了老解放区。村边道旁，支前的群众向战士们手里、衣兜里塞着煮熟的鸡蛋、烙饼、白薯、包子、以及花生、大枣、核桃等食品。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一路马不停蹄、人不歇

脚、向目的地奔去。解放区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组织起支前大军，大车队、担架队、扁担队，人欢马叫，伴随着英勇的野战军行军队伍向敌军席卷而去。只见广阔无垠的大平原上，一片龙腾虎跃的景象。

10月19日，歼敌部队到达清风店附近，并立即向进至清风店北边的敌第三军展开包围。

这个时候，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两个师和军部共1.4万余人，正驻扎在几个小村子里。一路上，不断遭到我独8旅和民兵的袭击，一日数惊。敌军进入我解放区后，村子里空无一人，找不到一粒粮，甚至井都被堵死，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在我军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时，敌第三军每日只能爬行二三十里。当10日下午先头部队报告说发现共军主力时，罗历戎自恃装备精良，部队训练有素，而且与南北驻军相距不远，自信地将部队收缩到以西南合村为中心的几个村子里。摆开梅花形防御阵式，并发电报向石家庄和北平守敌求援。

20日天刚亮，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了猛攻。敌人拼死反抗，在飞机的支援下用所有的轻重武器筑起了一道道火墙，并不时发起反冲击。

第三军被围后，敌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急忙组织了5个师，由此向南企图援救第三军。孙连仲还亲自

坐飞机到部队上空督战。敌军的攻势开始时很猛，接连冲过徐水和保定一线我军的阻击。但过了保定之后，南援之敌被我担任打援的 4 个旅死死地钉住，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

此时，经过一白天的激战，我军已把敌第三军压缩到不到 400 户人家的西南合村里，上万敌军拥在一起，我军的每一炮都给敌人造成伤亡。入夜之后，我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残敌在我猛烈炮火的打击下，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组织抵抗。敌军长罗历戎只得命令部下分路突围，自己却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带上一些随从想蒙



1947年10月，罗瑞卿（右七）同聂荣臻等（右四）在清风店前线司令部与被俘的国民党军第 3 军军长罗历戎（左一）谈话

混逃脱，但没走多远，便被我军俘虏了。

清风店一战，我军经一天一夜，将敌两个师一个军部全部歼灭，实现了罗瑞卿打大的歼灭战的愿望。望着大平原，罗瑞卿心里充满着喜悦，这是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个翻身仗。

清风店战役之后，石家庄守敌的力量大为削弱，罗瑞卿感到，攻打石家庄这个大城市的时机已经成熟。

石家庄位于石德、平汉、正太三条铁路的交会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城中的全面防务由敌第32师师长刘英负责。守敌兵力约2万左右，其中只有32师是正规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余都是周围各地退到石家庄的地主土匪武装。守敌利用日伪时期留下的城防工事，又不断加固和扩建，形成了三道防御阵地，构筑了大小碉堡6000余个。敌师长刘英称石家庄固若金汤，共军没有飞机坦克，就别想拿下石家庄。

罗瑞卿分析敌情后认为，石家庄周围都是解放区，实际上已成孤岛，守敌士气不高，兵力空虚。而我军经过清风店之战，士气正高，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攻坚能力上都有把握打下石家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向中央发报，请求批准攻打石家庄，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由于攻打石家庄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军将要

攻打的第一座大城市，中央对这一战役高度重视，朱德总司令亲临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与聂荣臻、罗瑞卿、杨得志等野司首长一起研究制定攻城方案。

经过充分准备，11月6日攻城战打响了。我军指战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于次日已攻占机场和城外的云盘山制高点，并在云盘山上架起了大炮，居高临下猛轰城中守敌。经过几天的激烈拼杀，扫清了敌人的外围工事，于12日凌晨开始向敌城内的核心工事发起进攻。正在我军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敌核心工事时，罗瑞卿接到报告，敌师长刘英被我军俘虏了。

原来，我四纵的侦察兵越过敌人防线，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敌人的师指挥所，把刘英和正在指挥所的一群敌军官给捉了回来。刘英被带到四纵第10旅政委傅崇碧面前。傅崇碧命刘英下令，让守敌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守敌见主将被俘，抵抗也无意义，纷纷停火投降。就这样仅用了6天时间，我军就攻克了石家庄，歼敌2.4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特别是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罗瑞卿后来说：清风店和石家庄“这两个战役才算晋察冀军民打了翻身仗”。

驰骋晋察冀热绥

石家庄战役，晋察冀军区进行了整编，将一些地方部队合编，新组建了三个纵队。1948年2月 杨得志、罗瑞卿等率领野战军进行短期休整后，即分为左翼右翼两个兵团 北上出击察哈尔 南绥远东地区 攻占了吉家庄、蔚县、广灵、阳原、阳高、丰镇、凉城、和林格尔等城镇，消灭了傅作义的一些地方部队。

1948年4月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道从陕北转移至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四五月间，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城南庄，向罗指出，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要求集中统一的形势下，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对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不够，他要求野战军去冀东寻找战机，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并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争取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将驻华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并夺取除平、津以外的大片地区。

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

解放区及其党政军机关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徐向前率领由晋冀鲁豫一些部队组成的第一兵团在山西转战；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部队编为第二兵团。



华北军区领导人合影。右起：罗瑞卿、聂荣臻、杨成武、杨得志、李天焕

罗瑞卿返回前线后不久，第二兵团一分为二。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第三、第四纵队过平绥路东进；杨成武率领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留于平汉路以西，举行了保北战役。8月间组成第三兵团 进军绥远 迫使傅作

义无暇东顾，以配合东北作战。

杨、罗、耿率部东进以后，经延庆、怀柔、攻克石匣、隆化、丰宁，切断了平承路。随后以第三纵队在平谷附近地区牵制敌人，与此同时，杨得志、罗瑞卿率领第四纵队秘密东进，连克榛子镇、丰润、昌黎，与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会师于遵化地区。傅作义急调7个师自平谷经三河、蓟县东援。第三纵队即乘机围攻古北口，调动傅敌回援。三纵、四纵，一西一东，攻势此起彼落，以调动傅作义，使其往来奔波于平北、冀东，陷入被动境地。但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军区我二兵团也未获歼敌战机。

部队转战平北、冀东山区以来，为寻找战机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山区拉来拉去，很是疲劳。部队指战员多是冀中人，来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冀东山区，有时连高粱米也吃不上，以白薯充饥，不少人滋长了害怕艰苦的思想。阴历八月一到，中秋将至。按冀中的习惯，中秋节将全家团聚，吃月饼，吃大鸭梨，许多人思恋故乡。就在这时，军委命令二兵团转到平绥路作战，以掩护第三兵团西进绥远。

9月2日，罗瑞卿在兵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动员。他说：“我有一个谜语，请大家猜一猜，谜面是：

西下有女人人爱，口中有口口难开。北方有田大家种，忠心报国把心摘。打四个字，是什么字啊？”停了一会，他见无人回答，乃自报谜底：“要回冀中。”一听这谜底，全场活跃。随后他接着说：“冀中当然好，那里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吃得好，许多同志的家属都在那里。现在八月十五快到了，好了，下命令回去吧。但是，这个命令下不得，因为革命战争不允许我们下这个命令。现在革命战争已经由防御转入进攻，发展到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决战的阶段。东北野战军正准备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关外。我们要配合东北野战军老大哥，在关内多打胜仗，拖住傅作义，阻止他派援兵出关，这就是全局。我们即将向热河、察哈尔边境转移，那里环境更加艰苦。我们吃这个苦正是为了多打胜仗，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同志们回去以后，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向指战员们讲清这个全局，不要怕强行军，不要怕爬山，不要怕一时粮食困难、吃不上饭，不要怕新解放区群众条件不好。只要我们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9月初，杨得志、罗瑞卿率领二兵团挥师向西，9月8日攻克三河，转入平北山区，拖住傅作义3个军，不仅直接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决战，而且掩护了第三兵团进

军绥远。9月下旬，在平绥路东段开展大规模袭击，在进攻康庄时，傅作义从东西两面快速来援。二兵团兵团部率领第四纵队退回平北山区，但第三纵队被阻断于平绥路南。

10月30日，三纵队赶到完县、唐县，敌害怕被歼，缩回保定，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破产。第二兵团奉命在行唐地区休整，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东北全境解放。4日蒋介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磋商。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估计华北亦将不保，为应付徐蚌大战，保住东南残局，他打算放弃平津。他以封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为饵，要傅率部南下。但是傅担心蒋借此吞并自己的力量，他不愿远离自己的老家绥远，感到在平津地区还有几十万大军，总还能支撑一个局面。

他估计解放军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进关，因此不愿南撤。蒋又考虑，让傅暂守平津，可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织新兵的时间，亦属有利。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决定采取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变的方针。

傅返回北平后立即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将其50万军队摆成从塘沽到归绥的长达1000余里的一字长蛇阵，

随时准备东逃入海或西窜绥远。

为了抓住蒋、傅两系在华北的军队，就地歼灭，毛泽东一面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入关，一面命令华北一兵团停攻太原，三兵团停攻绥远。

从 11月 12 日开始 东北野战军主力 10 个纵队继先遣部队四纵、十一纵之后向关内进军。

5 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攻克密云，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进关，忙令 35 军迅速撤回北平。

6 日，35 军从张家口出发。由于包围张家口的我三兵团把防守重点放在西面，守卫沙岭子的第一纵队又正在调整部署，致使第 35 军的 400 辆汽车突破沙岭子防线 急速东退。当晚 二兵团的第 12 旅对 35 军车队进行袭扰，35 军乃停止前进，在下花园至鸡鸣驿一带宿营。毛泽东得悉 35 军突破沙岭子防线东逃，立即严令第二兵团迅速占领下花园，阻止 35 军东逃。同时命令华北三兵团重新占领被 35 军突破的防线 严密包围张家口 命令东北四纵队占领怀柔、八达岭一带，切断傅作义东、西联系。

7 日 第 35 军继续东行 遭第 12 旅与地方部队的顽强阻击 进展迟缓。至傍晚 才进至新保安，一天只走了 15 公里。到新保安后，第 12 旅已将新保安以东公路破



我军为歼灭敌 35 军，部队指战员向敌阵地勇猛冲杀

坏。第 35 军副军长王雷震建议走另一条土路，连夜赶回北平。刚愎自用的 35 军军长郭景云不听劝告，决定就在新保安宿营。郭景云绰号郭麻子，此人既骄悍，又迷信。他认为新保安这个地名十分吉利，住在此地可保证安全。当时，华北第二兵团大部分部队尚在大洋河之南。当时气温已降至零下，河内结了薄冰，附近无桥。为了争取时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带领部队破冰下水，徒

涉布满冰茬、河水及胸的大洋河，急速前进。有一些战士穿的是空心棉裤，渡河时只好赤身下水。事后有些战士被冻伤得了病。7日清晨3时，兵团机关正准备渡河，又接到电报，毛泽东命令他们“全力在宣化、下花园一线坚决堵击”35军。杨、罗、耿正打着手电传阅毛泽东的电报，作战参谋赶来报告：“35军已过下花园，正奔向新保安。”

耿飏脱口而出：“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15公里了。”

“这当中还有个鸡鸣驿，下花园到鸡鸣驿有多远？”罗瑞卿问道。

“10公里。”耿飏回答。

杨得志说：“马上通知12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35军，一定要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同时发报给三纵、八纵和四纵，加快行军速度，拿出拼命的劲头来！”耿飏作补充。

“要让大家都明白”罗瑞卿严肃地说：“如果让35军从我们手里逃出新保安，那我们二兵团是交不了帐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

电台迅速发完电报，司令部立即在夜暗中渡过大洋河，向北疾进。天明后，人们可以看到罗瑞卿一边扬鞭疾行，一边对正在赶路的部队干部喊道：“你们要快啊，

把 35 军拖住，中央要求我们分秒必争！

这边，大部队在向北飞奔；那边，被隔在平张路以北的二兵团的第 12 旅早在 6 日已在鸡鸣驿附近同 35 军接上了火。他们一面在前面顶住敌人，一面在后面抢挖工事。7 日他们同 35 军激战一整天，为兵团主力赶到争取了时间。7 日夜大部队陆续赶到，三纵在西，四纵在东，逐渐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当二兵团正在前进和展开的过程中，7 日晚 20 时，毛泽东又致电杨、罗、耿，指出：“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但此时 35 军已在新保安宿营，这为二兵团挡住 35 军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8 日拂晓，二兵团终于完成了对新保安之敌的包围。从时间上，部队比中央军委的要求虽然晚到了一天，但终于将 35 军包围，仍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扬。35 军被围后，傅作义派 104 军安春山部由怀来西出，企图接应 35 军，被晋察冀四纵所阻，转而向南，准备隐蔽绕进新保安，但进至马圈，又被三纵所阻。此时两敌相距只有 4 公里，但郭景云和安春山素不相得。他们一个在新保安，一个在马圈，通过无线电话，郭叫安再前进，安说新保安地形如同锅底，反正守不住，叫郭突围。而华北二兵团背靠背，两面抗击，两敌你推我，我推你，就

是不能会合。

在部队合围新保安的同时，二兵团指挥所住进了离新保安约5里路的赵家山。这是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房屋窄小。耿飏风趣地回忆道：“在那种房子里设立指挥所，别说挂地图，就是我们‘杨罗耿’三人都转不开身子。”为了与部队联络，杨得志、耿飏头顶一条棉被，就在一个院子里打着手电看地图。罗瑞卿出去找设指挥所的房子，他发现了一个碾棚，里面的碾盘足有3张办公桌大。他一回来便招呼道：“走，统统上大碾棚。”于是在征得老乡同意后，指挥所便设在这个碾棚里。碾子掀到地下当了凳子，碾中轴安马灯，碾盘成为硕大的办公桌，铺上地图，安好电话，架好电台，杨、罗、耿便



我军某部向新保安敌阵地冲击

在此处指挥新保安的战斗。电台刚架好 杨、罗、耿便电令各纵队，不得把敌人放跑，谁放跑敌人，要追究责任。

在九十月间，二兵团两过平绥铁路，两次掉了部队。9月下旬把三纵隔在了铁路南，10月下旬又把12旅隔在了铁路北。这两次都应当算是失着。但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却把这两步失着变成了好棋。第一次，被隔在路南的三纵队在阻击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次，被隔在路北的12旅在阻止第35军东逃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12旅，说不定35军就会逃回北平。这两次失着结果都是“歪打正着”这是谁事先也没有预料到的偶然性的事件。但是必然性就存在于偶然性之中。

将新保安围起来后 指战员们纷纷请战。杨、罗、耿也向军委建议，尽快消灭新保安之敌。然而，毛泽东在11日发出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却提出，为使蒋介石不能迅速作出让傅作义集团放弃天津南下的决策 在两周内对张家口、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以便在部署完成之后按照“第一塘沽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 最后北平区”的顺序，各个歼灭敌人。“只要塘沽区（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 就全局皆活了。”

罗瑞卿、杨得志等在掌握了这一决策的精神之后，立即向部队贯彻。他们联袂来到三纵队，参加了纵队的党委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为什么围起来又不打？”在纵队领导汇报了指战员的思想动态后，杨得志首先说明了“围而不打”是为了稳住平津守敌，不使其从海上逃跑，然后再就地全歼。罗瑞卿接着具体分析了35军在傅系中的地位，他说“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光汽车就有400多辆，丢掉他们南逃，傅作义心痛。围起来不打就等于给他留下个‘想头’，拖住了他的腿。”最后，罗瑞卿要求这个纵队在7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保证做到一攻即克。

为了将毛泽东的决策化为指战员思想和行动，罗瑞卿殚精竭虑，日夜操劳。杨得志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罗瑞卿同志在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亲自组织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向广大指战员讲述“围而不打”对全歼华北之敌、夺取平津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宣传战役中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道理，深入细致地做工作，帮助大家克服急躁情绪。同时采取广播喊话；阵地前竖起写着“缴枪不杀，欢迎过来，立功者受奖”的标语牌；释放俘虏，让他们带回大量的《告傅作义官兵书》、《通行

证”给35军领导人写劝降信等多种形式，向35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经过广大干部做工作，部队的战斗情绪非常旺盛。他们把围困35军比做煮山药蛋，并编成了顺口溜：

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已经放在锅里边。

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煮越软绵。

同志们，别着急，

山药蛋不熟不能吃。

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攻击。

这首顺口溜很快传遍围攻新保安的各个部队。

这一期间，35军曾多次突围，但都被挡了回去。郭景云决心顽抗到底。为了欺骗官兵为他卖命，他又让传话给排以上军官，说：“我们今天守新保安，很有把握。因为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永安，我现在领着弟兄们守新保安，这叫三安临头，象征我们安然太平。同时，本军是傅总司令的王牌，傅先生绝不会坐视不救，将来定可解围。”

20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已完成对平、津、张家口战略包围，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已被斩为三截。21日中午，总攻即将开始，指挥所迁到离新保安只



华北第二兵团政委罗瑞卿（披大衣者）等领导估平绥
前线迎接东北野战军的到来

有1000多米的地方。此地居高临下，新保安的街道屋宇都看得清清楚楚。罗瑞卿和杨得志站在指挥所外观看，罗瑞卿激动地对杨得志说：“这锅饭到底做熟了！”一位参谋插话：“这锅山药蛋都要煮烂了。”罗瑞卿挥了挥手说：“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那个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啦！”

当日对新保安的总攻发起。翌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1.5万余人，35军军长郭景云命令部下在他的指挥部浇汽油，准备与部属集体自焚。他的部下不再听他的命令，他只得举枪自杀身亡。这是因败在杨、罗、耿

手下而自杀的第二个 35军军长。新保安之役 终于将傅作义的王牌 35 军来了个连锅端。罗瑞卿、杨得志、耿飚和二兵团的广大官兵都为之兴奋不已。

23 日 解放军攻克张家口。翌年 1 月 15 日 攻克天津 17 日攻克塘沽。31 日 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时 华北野战军的一、二、三兵团已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18、19、20 兵团。杨、罗、耿率 19 兵团驻扎在颐和园以北的大有庄。一天，他们应邀赴宴，罗瑞卿又一次踏进了分别已有两年半的北京饭店。在宴会上，他同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傅作义见了面。至此，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

早在进入北平前，罗瑞卿等就接到毛泽东要他们休整后开赴太原前线的命令。此时，一些指战员因胜利而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罗瑞卿授意政治部主任潘自力搞一个闯王李自成的材料发到部队，要求大家以闯王进京为鉴戒，戒骄戒躁，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北平期间，二兵团接受了溶编由北平开出城的一个原国民党整编军的任务。但直到 2 月中旬，这个工作尚未开始。毛泽东决定 由 19 兵团派出执行溶编任务的干部到达接受溶编部队，编成独立师，然后率其在 19 兵团后跟进，开往太原前线。

2月19日，19兵团奉命由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率领开赴太原前线。杨、罗、耿各乘一辆吉普车到天津，向第四野战军打天津的部队学习攻城经验，随后经河间到达石家庄，部队在石家庄进行休整。3月上旬，罗瑞卿赴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罗瑞卿等赶到太原前线。

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统一指挥18、19、20兵团，以18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成立中共中央太原前线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

由于徐向前有病，军委决定由罗瑞卿、周士第暂代徐向前指挥。太原战斗发起前，彭德怀来到前线。

4月上旬，罗瑞卿代表总前委作了总攻太原政治工作报告，分拆了打太原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提出了打太原的四个方案，决定了打掉外围而后破城的方案。

他强调，不仅军事上要打胜仗，而且政治上也要打胜仗。要严格执行政策、执行纪律。他针对参加攻太原的有华北三个兵团和西北、东北兄弟部队参加的情况，特别强调团结，要谦虚、学习、热情、克己。总之，要做到打好、交好、接好、团结好。

在太原前线，罗瑞卿主持了第19兵团对跟进的原国民党部队进行溶编的工作首先对国民党官兵进行了阶级诉苦教育和人民军队的纪律教育，对其军官进行了审查，然后分别不同情况或资助返乡，或送军校受训，或留任。对其士兵除资遣返乡者外绝大部分补入部



在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期间，罗瑞卿（左）同彭德怀亲切交谈

队。

从4月1日起，中共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会谈。至1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下令拒绝签字，和谈破裂。同一天，对太原的总攻开始。激战4天后，太原解放。

太原打下后，罗瑞卿作为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徐向前为主任，另一副主任是赖若愚），十分注意掌握城市政策，严格执行纪律。对于违犯政策和纪律的现象，他从不马马虎虎，而是铁面无私，坚决执行纪律。当时，有的纵队曾从商人已经出走的商店里搞来黄金，有的剧团到仓库搞布来做幕布。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对黄金，他要求如数退回，对布，他要求折价付款。对于严重违犯纪律的事例，除给当事人必要的处分外，还要大会、小会批评。他的批评既理直气壮，又尖锐泼辣，没有什么委婉、含蓄，不讲什么情面。常常说得被批评者心跳耳热，宛如屁股下面着了火，再也坐不住了。由于从上到下严格要求，太原驻军的纪律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

清除旧社会污泥浊水

1949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召罗瑞卿到北平。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等同志话别后，便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瑞卿提出希望随四野南下，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面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随后，即在李克农协助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公安



建国初期的罗瑞卿

部下设政治保卫局、经济保卫局、治安行政局、武装保卫局、边防保卫局、人事局和办公厅等机构。经中央军委同意，从各野战军调来徐子荣、雷荣天、卓雄、邓小东、蔡顺礼等同志分任各局局长。又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军政大学、华北革命大学、苏南公学及各地党委抽

调大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公安部，并从部队抽调师团干部 400 人作为骨干，为公安队伍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7 月 6 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成立，8 月 14 日开始办

公。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高干会议。党中央领导人接见部分与会人员时，周恩来：“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听了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又被政务院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5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领导机构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初期，大陆上的战争刚刚结束，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仍然在进行猖狂的复辟活动和破坏活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氓地痞、恶霸盗匪仍继续为非作歹。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比如妓院、烟馆、赌场等依然存在。对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亟待清扫和荡涤。

罗瑞卿一上任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限期登记，二是严厉打击盗匪流氓，三是查禁烟毒，四是封闭妓院，取缔娼妓。

镇压反革命的指挥员

1950年夏天，在北京流传着这样的谣言：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要改朝换代了。万寿山闹鬼，人们未见，石狮子流泪，或许是谁在石狮子头上洒了水，但鼓楼冒烟却是众人亲眼目睹。每天傍晚，鼓楼前都聚了不少人仰望鼓楼，只见上面烟雾袅袅。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流传了不少谣言。在察哈尔，有人散布：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这个谣言又传到绥远、河北、北京、天津，闹得人心惶惶。一个村庄，到夜里如果有坏分子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顷刻间便会全村大乱。

由于割蛋的谣言过于荒谬，在文化素质较高的北京市民中，信者甚少，但相信鼓楼冒烟者却日见其多。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一天傍晚，罗瑞卿也来到了鼓楼前，他果然看到鼓楼顶上有烟状物在上下翻腾，颜色很淡，不似有火。为了弄清究竟，他派人上去看了看，原来是成千上万的小虫子在屋顶翻飞盘旋。

这个谣言虽然破掉了，但罗瑞卿又联想到全国各地的敌情。当时 湘西、广西一带匪患尚未肃清 湘桂铁路上的车站被土匪骚扰，停车已经有好几天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日益嚣张，有造假钞票的，有企图炸铁路桥梁的，有窃取机密文件的，有企图暗杀领导干部的。美军9月15日在仁川登陆以后，许多反革命分子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 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 于是跃跃欲试，企图与蒋里应外合，更加紧了反革命活动，组织了



1950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正式组建。图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右）陪同朱德检阅部队

形形色色的地下军，委任了各路司令和大批的主席、专员、县长，准备等美军到达后“接受”政权。他们在各地明目张胆地制造谣言，破坏交通，抢劫财物，焚烧仓库，杀害干部。从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全年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仅广西一省就有7200人。

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研究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面对这些敌情，毛泽东问罗瑞卿：“准备怎么办。”罗瑞卿答道：“现在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人民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要求我们镇压反革命。我们商量了一下，主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无论是杀、关、管，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毛泽东让罗瑞卿、彭真等4人起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的指示。彭、罗等连夜起草，于10月10日凌晨2时将指示草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字未改，批示于当日下午下发全党执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十指示”。

“双十指示”指出：当前有不少干部和党员存在着一种骄傲轻敌思想，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与乱打乱杀

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群众不满，认为我们“宽大无边”。

“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对反革命分子按照其罪恶大小轻重，分别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解放后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该杀者则杀，该监禁和改造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当实行管制，加以考察。对于真正的胁从分子，自动坦白的分子和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给予宽大的处理，或给适当的奖励。

以上这些政策随后被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者受奖”这样的口号。

为了防止在镇反中发生“左”的偏向，“指示”还指出：必须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

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的分子,则需报告中央批准。关于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公安、检察、法院机关的领导。

10月16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公安高干会议,传达了“双十指示”部署镇反。随后,他到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浙江、福建、山东等几个省市进行视察,亲自向各地群众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还批转了各地大量的镇反工作报告。仅1951年他到各处做报告达39次,批阅镇反工作报告400余件。

在隐蔽斗争战线上

罗瑞卿在领导镇反运动的同时，还领导着同境外敌人进行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这一条战线见不到火光，闻不到硝烟，但斗争异常紧张、尖锐。这就是隐蔽斗争的战线，其斗争对象则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大陆和境外敌人向大陆派遣的以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形形色色的特务间谍。

在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时代，由于我们力量弱小，所处环境艰苦，敌人所派遣的潜伏特务，不是很快被发现，便是因特务受不了艰苦而不能存身。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并占有了一些城市，敌人派遣或潜伏特务进行破坏的案例增多了，其中著名的案件有城南庄轰炸案和李兆麟将军被暗杀案等等。

城南庄轰炸案发生在1948年5月。当时毛泽东刚刚来到阜平县城南庄，敌机便前来轰炸，要不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军区后勤部长赵尔陆强行让毛泽东坐担架进入防空洞，他的生命便会发生危险。因为就

在毛泽东刚离开，敌人的 5 颗炸弹便落地，其中一颗就在毛泽东住的房前爆炸，门窗玻璃、屋内的热水瓶还有一篮鸡蛋都炸碎了。事后保卫部门查了许久，未破案。直到大同、保定解放后查了敌伪档案，才知是被国民党收买、当了上尉谍报员的当时军区司令部烟厂经理孟宪德和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向敌人送的情报。此 2 人在镇反运动中已处决。

敌特破坏案在东北地区发生的更多。1946 年 3 月 9 日，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遇刺。

1948 年 随着大、中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美国支持下在解放区内采取了长期潜伏、武装游击、恐怖暗害与重点破坏的方法。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还说，他们的企图是“加强共区反共武力，打击共匪腹背，加紧准备反攻，俟机开辟第二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已沦为帝国主义特务机关的附庸，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已成为危害我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美国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共同组建了以美国为指导的特务统一体，组建了从东北到西南，环绕中国大陆的特务网络，开办训练班，训练国民党老特工，培养“万能情报员”。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

机已到，在美国支持有时甚至是直接操纵下，加紧向大陆派遣特务间谍，其中有空投的，有从海上偷渡的，有从陆地边境潜入的。他们还组织“反共救国军”等特务武装。并以“杀死一名部长 奖励十条黄金”为饵 派杀手进大陆，妄图暗杀高级干部和重要的民主人士。当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这方面敌情时，毛泽东风趣地将其概括为“海、陆、空”叫做“海里爬上来、陆地钻进来、空中掉下来”。1953年 国民党专管“心理作战”的第六组和美国以“西方企业公司”为代号的心理作战机构联合组成了“心理作战部”。1955年国民党的“国家安全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联合组建“中美联合办公处”以加强在“心战”情报和爆破活动方面的合作。美国还向中国大陆直接派遣间谍。其中以“44 海外观测队”及由美国网罗一些人组织并由他们直接控制的“自由中国运动”活动最为嚣张。

罗瑞卿一出任公安部长即着手部署隐蔽战线的斗争。在1949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并结合隐蔽战线斗争的实际提出：要“和不拿枪的或不公开拿枪的敌人作战”为此“我们要组织一个与敌人作隐蔽斗争的队伍，这不是马马虎虎的队伍。要组织这个队伍，我

们的情报工作、公安干部、警察、公安武装都要组织起来打仗。我们现在就是组织这样一个队伍的会议，同隐蔽敌人打仗，而且一定要战胜他们。”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隐蔽战线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敌情不明。过去中共中央社会部尽管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内情有所了解，但在他们撤到台湾后有何变化已不



1950年1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太清楚，尤其是对美国等间谍机构了解得更少，正如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我们对帝国主义特务内情知道的还不多 还相当盲目。”二是经验不多，知识不够。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 在隐蔽战线已取得一些经验的是东北地区，那里解放较早，有一些大中城市。1946年5月28日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害。在中共东北局进驻哈尔滨后，国民党特务加紧其特务破坏活动，相继发生“露绿牛奶馆”案、曹兴武特务破坏案等案件。一开始，东北地区的公安机关采取过见头就抓、见案就破的办法，这种做法往往是打草惊蛇，割断线索，使对敌人的打击形成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而打不中敌人的要害。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1946年8月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社会部决定建立有系统的侦察工作，反对见头就抓，以审讯代替侦察的错误倾向。要在掌握敌情线索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突破几个重要案件。这一办法果然奏效，李兆麟将军被害等四五个案件不仅全部破获，而且还一举发现和摧毁了军统齐齐哈尔组、哈尔滨特别组、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胡宗南的西安战干团哈尔滨特务组等特务组织，特别是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姜鹏飞勾结会

道门头子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大案，缴获了电台和大批罪证，在暴乱即将发生的时候，先机制敌，得到陈云、彭真等同志的表扬。

在此基础上，1947年1月，东北局社会部提出了侦察工作要充分认识隐蔽战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并据此确定方针，安排工作。

罗瑞卿非常赞赏这一提法。当他得知这一提法是由原中共北满分局社会部长陈龙首先提出时，1950年6月，便将正在南京市任公安局长的陈龙调到公安部参加筹备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8月25日第一次全国侦察会议在北京召开，罗瑞卿委托陈龙主持会议并做报告。陈龙在报告中就当前的敌情和隐蔽斗争的特点、工作的方针及部署作了全面的详尽的阐述。

罗瑞卿在总结时充分肯定了陈龙的报告。他指出：所谓侦察工作，就是公安保卫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反革命作斗争有许多种形式，这许多种形式是根据形势、敌情而变的。侦察工作是多种斗争形式的一种，是最重要的一种。没有这种斗争形式，不采取这种斗争形式，对隐蔽敌人有效的加以摧毁是不可能的。侦察工作一定要照顾隐蔽斗争长期的需要。在进行具体案件侦破时，侦破一个案子要照顾到另一个案子，要反对侦察工

作的近视眼和急性病，但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案件都要进行长期侦察，为了使侦察工作确有成效，必须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侦察。

早在 1949 年 10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就指出：“必须大力加强侦察工作 加强秘密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 加强秘密的专案侦察工作。”他认为：“如果说反革命是垃圾，则隐蔽的敌人就是细菌，垃圾不清除就可以生细菌。垃圾可以用眼看到，清道夫就可以解决 细菌则需要显微镜 需要医生。侦察工作 可以说是显微镜，群众可以说是眼睛，有了眼睛，再有了显微镜，才能彻底消灭敌人。”

他强调，发展秘密力量“应在我们可靠骨干指挥之下，以能否发现、接近敌人并与敌人战斗的作用为主要标准。”要按照毛泽东的策略思想 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要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运用敌人营垒的人，回过头去打击敌人。

罗瑞卿指出：秘密工作是一件锐利的武器。而武器本身就包含着危险性，可以杀伤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运用得好可以致敌于死命；运用不好，丧失警惕，也可能会使自己吃亏的。这就是说，秘密工作可以达到损敌利己的目的，但亦可能造成损己利敌的结果，问题就在

于争取前者 and 避免后者，这是我们建设秘密工作与运用秘密工作的一个总的原则。

怎样充分发挥秘密力量作用而又防止其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呢？他认为，在纠正当时对秘密工作束手束脚的偏向的同时，也要防止对一些人轻于信任和丧失警惕的偏向。

在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期间，罗瑞卿及时将会议准备确定的方针及他所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呈报给毛泽东。9月20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这一期间罗瑞卿还口头向毛泽东汇报了准备控制敌人的交通线和运送破坏、爆炸器材的运输线，并准备有条件地选择一些人设法打到敌人内部去的打算。毛泽东认为可行，并指示说：“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 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甩几个手榴弹，烧两间茅房子，到敌人那里去报告，只要不死人就行。”

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以后，各级公安部门经过艰苦经营，逐步培养了政治上可靠、能攻善战的侦察干部队伍，并建设了一支秘密力量。

20世纪50年代 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 采取多种方法，对在我国周边地区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动向，特别是重大行动的动向，能够大体掌握，及时予以

防范。

1950年8月天津和上海公安机关获悉段云鹏将于最近第三次潜入大陆。

段云鹏，自幼习武，能飞檐走壁，解放前曾是北平、天津一带有名的飞贼。1946年为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所招募，为该站侦防组中尉组员。同年7月他奉命监视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北平解放前夕，为了破坏北平和平谈判，在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搞爆炸，炸死何的一个女儿，何思源夫妇受重伤。段云鹏逃到台湾后因其有“功”当了保密局华北行动组组长，曾于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两次潜入京津地区，直接间接发展特务50余人，组成“天津特别行动组”、“北平行动组”和“情报组”策划了北京火药库爆炸案和天津无轨电车爆炸案。对于他这两次潜入大陆，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逐步清除了他的爪牙，打掉了他在大陆活动的基础。由于他熟悉中南海的地形，台湾保密局特务头毛人凤曾3次找他谈话，要他再次潜入北京，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4年6月段云鹏进入香港。罗瑞卿得悉段云鹏又将潜入大陆后于6月25日批示必须严密布置妥

设圈套，将段匪诱而歼之。并部署北京市、天津市公安局张网以待。过了一段时间，段云鹏仍在香港逗留，并未潜入大陆。公安部门考虑，在大陆张网固然必要，但他如不来，只能消极等待；要捉住这个飞贼，须在他身边建立“内线”以便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 俟机诱捕。于是，选择了秘密力量接近他并取得了他的信任。1954年9月，段云鹏在一次偷渡失败后，放弃了再次偷渡的打算，在秘密力量的诱导下，完全按公安部门为其设计的路线潜入广州，落进了预设的圈套。段云鹏就擒，除掉了一个大祸害，罗瑞卿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在此前后，国民党派出的企图到广州谋害叶剑英的赵一帆，企图利用旧关系伺机混入机关内部暗害中央领导人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杀手，在公安部采取强有力的侦察措施下也一一俯首就擒。

段云鹏这个“飞贼”只能翻墙上房 鼠窃狗偷。但在隐蔽战线上确实也活捉过名符其实的“飞贼”。

1952年8月，公安部发现长白山地区有敌人空投的特务在活动，立即一面发动群众，对不三不四的人严加盘查、防范；一面组织力量进山搜捕。9月20日，美国间谍飞机空投一名化装成志愿军的特务，被群众扭送到安

图县一派出所。经审讯，知其名叫李英军，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团长，逃到香港后参加了“自由中国运动”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蔡文治，也就是罗瑞卿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谈判对手，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这个组织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支持下组成的。

据李英军招供，他此次由日本空投长白山，是以观察员身份来检查7月13日空投的文世杰原名张载文队与特务李麟阁建立游击基地的进展情况的。他完成任务的时限为一到一个半月，他返回日本有3个途径：一是“空路”即用飞机来接；二是“武路”即从海上走；三是“荣路”，即从香港走。他还招供，沈衡年队的5名特务将于近期空投到长白山区。

10月间，吉林省公安厅组织力量进山清剿。4日，全歼沈衡年队，活捉沈衡年与电台台长等人。31日全歼文世杰队，活捉队长张载文和电台台长牛松林等人，击毙一名。

经审讯，张载文、沈衡年均供认，他们是由蔡文治领导的“自由中国运动”派来的，任务是“长期生存潜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直接领导张载文的美国上校爱·斯考特·马丁对张说：“你们的任务是开辟交通线，不久还会派更多的人来。”

为了进一步弄清美国间谍机关的战略意图，公安部同意东北公安部门利用李英军、张载文、沈衡年及其电台，设法调动美国飞机前来“空投”，以将敌机击落，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11月初，美特上钩了，空投了物资。11月22日又来电，决定在29日零时派飞机来空取李英军。当日夜，当美机到达空取场上空时，公安部门即按美特要求，点燃场地信号，引诱敌机降落。就在敌机向空取架低飞接近的瞬间，枪炮齐发，击毁飞机，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被活捉。当罗瑞卿听到这一捷报时，高兴地说：“八路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用土办法打下了洋飞机，好得很！”顺带说一下，在1946年，罗瑞卿和蔡文治曾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较量。到了50年代，在隐蔽斗争战线，他们又进行了较量，但双方已不是面对面，而是远隔重洋。后来，蔡文治加入了美国籍，80年代曾应叶剑英和耿飏之邀，回国访问，并参加了黄埔同学会，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然而此时罗瑞卿已经逝世了。如果他仍健在，同蔡文治也是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50年代中期，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美国间谍机关的支持下，网罗、训练了数以百计的行动手，制定了各式

各样的爆破计划，准备在五一、十一等节日到大陆搞爆破，大有想把大陆炸个天翻地覆之势！罗瑞卿得悉后立即下令：“炸弹不许过韶关！”并要求侦察、情报部门严密防范，先机制敌，务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在十分急迫、激烈的斗争中，各有关地方的公安部门紧急动员起来，侦察与情报相结合，充分发挥秘密工作和群众工作密切配合的优势，把运进大陆炸弹的数量、运转渠道、落脚点和行动手的绝大部分控制了起来。国民党陆续运入大陆的炸弹共有 400 余颗，纷纷落入我们手中，炸响的只有一颗，只炸坏了靠近边境铁路上的一根铁轨。此外，有些特务不敢到大陆来，便在与大陆交界处的香港、澳门一侧引爆几颗炸弹，只要港澳报纸一登报，特务就可以向台湾特务机关“邀功请赏”。

日理万机的总参谋长

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4月，罗瑞卿被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后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1961年11月，罗瑞卿兼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协助周恩来、贺龙、聂荣臻，把发展尖端武器的任务担在肩上。北至哈尔滨，南到西昌，东去上海，西往戈壁。他多次深入科研第一线，抓整顿，抓质量，抓安全，抓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生活。他十分注意处理好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的关系，军工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关系。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军队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在战斗最紧张的10月和11月，工作异常繁忙，经常召开紧急会议，综合分析



1959年10月，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左二）同张爱萍（左一）视察炮兵部队时，询问测距机使用情况

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及各位元帅报告，为他们作出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化作命令，发到西藏和新疆参战部队。

1962年，罗瑞卿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3年12月，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推荐第12军第100团第2连连长郭兴福的教学法。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毛泽东批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号召全军行动起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

罗瑞卿认为“政治上的个人模范有雷锋，四好连队



1964年，罗瑞卿与郭兴福交谈

的典型有好八连、还有其他连队……在军事教学法方面树立一个典型，有好处。”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工作。随后，罗瑞卿建议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都表示同意。为此组成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在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练兵热潮中，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对象是连队。2月26日，他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郭兴福教学法还要加强宣传。石油工业部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讲民气，部队讲士气，个人讲志气。三气合一就是革命。毛主席常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罗瑞卿不但亲自赴北京南苑观看北京军区几个分队的军事表演，而且在参观侦察分队捕俘训练中的徒手夺枪和徒手对匕首的格斗表演后说：“全军所有侦察分队都要像你们这样练，都要练出你们这套本领来，艺高人胆大，勇敢加技术，什么敌人都不在话下。”同时，他也反对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他批评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样干是要打败仗的！“是对推广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的破坏。”

由于罗瑞卿抓军事大比武有成绩，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

毅、贺龙、聂荣臻等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在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毛泽东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 不能只要钱不要枪。”他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等谈话时又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

随后，罗瑞卿在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中，注重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技术的辩证统一，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学风，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由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种种作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受到了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正如罗瑞卿在自传的最后写道：

“从1966年12月20日深夜到现在，这三年多来我的经历就是挨斗、受审、坐班房、写材料。在这些方面我当然是很痛苦的，有许多冤屈！一切人世间的侮辱我都受过了，受够了！”但是他仍然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作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保持“延安精神”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3月，罗瑞卿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印象极深。太原解放后，他建议政治部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印发给干部阅读，让大家接受闯王进京的教训，保持和发扬共产党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6月，罗瑞卿奉命调入北京任公安部长，他的家也迁至北京，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一座楼房内。此前，还是在1947年，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曾经到过北平，但时间不长便回张家口去了。部队从张家口撤出后，她便随晋察冀军区撤到阜平等地。当时，野战部队在前方打仗，家属、孩子都留在后方。对孩子们的教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办了一所荣臻学校，郝治平即出任该校的教员，直到进北平，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八一学校。

缎库胡同这座楼房连低矮的顶楼共有 3 层 房间较多。罗瑞卿建议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搬进去，两家各住一半。王昭不搬，罗瑞卿又命令他的秘书王仲方将家搬进去。由于公安部办公室紧张，他又让机要处搬到他住的院内办公。这所院子大门已年久失修，门框已经耷拉下来，开关甚为不便。门卫向管理员反映了几次，管理员老于便将机关木工请来把大门修了一下。新换的木板同原门上的木板颜色不一致，像是给门打了补丁，颇不雅观。老于怕木板时间久了会糟，同时也为了让大门好看一些，便让木工将大门油漆了一遍。罗瑞卿回来后见大门油漆一新，便把老于叫去问道：“是谁让油的？”于作了解释。罗瑞卿严肃地说：“隔壁的大门不是比我们的还破吗 人家不油漆不一样可以进出吗 你今后不要给我搞这种浪费 不要给我往脸上抹黑！”

他的办公室除了一张写字台、一个保险柜和一张皮椅外，还有两张单人沙发。办公厅副主任余光文看到沙发太旧了，趁他不在，给换了一套新的。他看到后追问，新沙发是哪里的，弄清来路后，他立即让余光文把那两张旧沙发换回来。

50 年代前期，每逢重大节日，罗瑞卿都要宴请公安部的几位苏联顾问，有时餐桌就摆在他家里。编译处

长姚艮拿来一条地毯将餐厅布置了一下。他想：反正这条地毯放在仓库里，还不如就放在这儿，省得今后办宴



1953年,罗瑞卿(左四)陪同毛泽东(左三)、陈毅(左二)视察海军“南昌”舰

会再搬。但宴会结束后，罗瑞卿便让姚把地毯搬走。姚答应了，可没有行动。谁知当他回到编译处时，地毯已经先送回来了。也是在这次宴会上，大师傅发了一些海参未用完。姚良一看已经发了，也不多，就未拿走。罗瑞卿发现后立即让姚良取走。

在吃饭方面，罗瑞卿历来是大师傅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在实行供给制的时代，他只关心一件事：伙食不能超过供给标准。他经常问管理员，伙食超支了没有，关照超支了就用他的津贴费补上。

他的衣服、鞋子破了，也是补补再穿。有一年在北戴河，天较热，在海边散步时，罗瑞卿脱了外衣，里面的背心上有几个洞。一同散步的康克清同他开玩笑地说：“嗨，背心上的窟窿是孩子们给捅的吧？”他的布鞋后跟磨破了，他吩咐警卫员小赵送上街去补一补。小赵对他说：“上次在四川买了两双，还有一双新的，穿新的吧！”他坚持补了再穿。

罗瑞卿不接受礼品。有一次苏联顾问伊凡诺夫由莫斯科经乌鲁木齐到北京，在乌鲁木齐拉了一些哈密瓜，请姚良送一些给罗瑞卿，罗瑞卿立即吩咐转送给病号。有时，南方一些省市送来一些时鲜果品，他总是一面让告诉送礼的人今后不要再送，一面将东西送到医院。

去。1957年冬，罗瑞卿去苏联访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送给他一台带有电唱机的落地式收音机，他回来后即送给部机关团委，供他们开展机关文化娱乐活动之用。在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期间，有些地方代表带来了苹果、葡萄等土特产。罗瑞卿在大会上宣布：“各地带来的东西，一律带回去。”参加会议的四川代表对公安部的干部说：“罗部长这一宣布，使我们如释重负，因为我们是空着手来的。”

罗瑞卿不收礼也有例外。1951年他到江苏去，他的老战友送给他几个无锡惠山的泥娃娃，他收下了。但在“三反”中，他在自我批评中又以此为例，认为自己“有失检点”作了认真检查。

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人们还没有计划生育的观念。到1953年，罗瑞卿已经有了8个孩子。最大的是罗瑞卿参加革命后不久他在老家的前妻生育的女儿玉华，老二是在延安时代他的前妻生育的儿子小青，郝治平生育有4个女儿：峪田、峪书、朵朵、点点，两个儿子：猛猛、了了。点点是早产，刚足7个月便降生，只有4斤重，放在协和医院的暖箱里，连吸奶的力气也没有，奶水需一点一点往她嘴里滴，因此罗瑞卿给她起名叫“点点”。了了出生于1953年，是罗瑞卿最小的孩子。他们不准备再

要孩子了 因此为他取名‘了了’。罗瑞卿家的孩子个子都很高 男孩子大都1米8左右 女孩子大都1米7左右。但是，在罗瑞卿家也有一个女儿比较矮，她叫邓金纳，是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邓发的女儿。邓发于1948年4月8日同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一道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此后，金纳一直生活在苏联，建国以后回国随母亲住在广州。当1950年罗瑞卿在广州检查工作时，金纳的母亲因金纳对广州气候不适应，向罗提出，要送金纳到北京读书，要求由罗瑞卿夫妇代管。为此，罗瑞卿特地写信给郝治平：

治平：

遵照你的意见，将田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纳，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六同我们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 再添一个 麻烦 没有办法 也应该照顾 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我出来一个多月，很想回去了，但是事情没有完又不好走，也不应走。我这个人作事，就是喜欢负责到底，你是知道的。这次出来走一趟，对我的意义很大，工作收获亦不少，你应为我高兴。

你现在身体怎样 希望你好好注意 经常去检查 不要大意。朵朵是不能再生病的，望多加注意。书儿去学校了，猛儿怎么办？

我买了一点东西，主要是衣料及孩子们的玩具，请你照收。

我很想你，但大约还要十天后才能与你见面。事情忙，不写了。

吻你！再吻你！

你的青

2月24日

1953年以后 罗瑞卿家9个孩子中 既有罗家的 也有邓发的，罗家的8个孩子又出自3个母亲 但是这些孩子相处十分和睦、融洽，彼此十分团结。根本原因在于罗瑞卿夫妇对孩子们不偏不向，一视同仁。

罗瑞卿很爱孩子 孩子们大部分在学校寄宿 罗瑞卿同他们见面的时间主要是在节假日的晚饭桌上。孩子们都把同父亲一起吃饭看成是过节，而罗瑞卿也把在饭桌上同孩子们谈话看成是一种乐趣。只要孩子们在家，罗瑞卿必定要同孩子们一块吃饭。

有一次在饭桌上 为了解一道几何题 朵朵和哥哥

争论起来，一气之下便放下碗筷，跑进自己的小屋，把门关上了。罗瑞卿见状，连忙劝她回来吃饭。朵朵不开门，罗瑞卿便站在门外耐心地把这道题应该如何做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直到朵朵破涕为笑为止。

在 60 年代初的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学校的伙食都不太好，孩子们肚子里油水很少，他们又正处于成长时期，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似乎吃多少也吃不饱。此时罗瑞卿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每逢节日，罗瑞



1963 年 5 月，罗瑞卿观看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罗瑞卿同演员陶玉玲（在剧中饰春妮）握手的照片。

卿夫妇便把总参机关供应的副食品拿出来给孩子们打牙祭。孩子们一上饭桌，顷刻间便“风卷残云”将这些食品一扫而光。罗瑞卿一面爱怜地看着孩子们吃，一面便诙谐地朗诵普希金的诗：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落地。
落地一切都吃净，
从此飞去无消息。

久而久之，孩子们也会背这首诗了，于是他一念，大家便面对饭菜已吃光的饭桌，一道来背这一首诗。

罗瑞卿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不过，从考虑加强罗瑞卿营养出发，建议罗瑞卿单独吃。但是，罗瑞卿拒绝了，只要他在家，孩子们也在家，他必定要同孩子们一块吃，绝无例外。

对于家里的孩子，罗瑞卿个个都爱，他只要有空，总是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他所喜爱的文体活动，只要可能他总要让孩子们一道参加，分享他的快乐。恰好组织上为他配了一辆三排座的大吉姆车，他高兴地对家人说：“这台车最适合我们用了。”而无论看球还是看戏，他都是自己掏钱买票。

在实行供给制的时代，有孩子的高级干部都有保姆

费，孩子多的干部可请两个保姆。由于罗家孩子多，管理员老于便给他报领了两份保姆费。罗瑞卿问老于是怎么回事，老于据实回答。罗瑞卿严肃地说：“我家里，秀芳是在编的，另外还有一个保姆，就不应再领了。多领的你如数退回，今后你报销什么东西，都要告诉我，不能超标准。”

由于孩子多，负担重，实行薪金制后，罗瑞卿夫妇的工资基本上是月光。当时，部队干部工资比地方同级干部工资要高20%左右，管理部门看到罗瑞卿花钱比较紧张，便提出，他是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应该按部队标准领工资。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知道后立即对管理部门说：“罗部长绝不会同意的，你们千万不要这么办。”后来罗瑞卿不知怎么知道了，果然反复对这种想法提出批评。“文革”中“造反派”几次抄他的家，发现他家一无金银财宝，二无大额存款，三无古玩字画，四无名烟名酒，五无绫罗绸缎，称得上是两袖清风。

罗瑞卿夫妇对孩子们很爱，但要求也很严格。罗瑞卿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出生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什么可特殊的。不能自恃特殊。如果说你们特殊，就应当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国家多作贡献。”

由于罗瑞卿工作忙，对孩子的教养，郝治平担负了

更多的责任。她自称是这一群孩子的一个班长，她把孩子们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对孩子们，她在生活上的原则是能吃饱、穿暖就行。

在50年代，人们都以艰苦朴素为荣，罗瑞卿家的孩子在穿着上也同样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孩子个子长高了、裤腿就再加上一截。大家都不感到这样做有什么寒碜。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毛泽东那里，有一次中央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说：“罗瑞卿穿的是带补丁的鞋，他家娃娃多，穿衣服大多是阿姨给做。一件衣服大的不能穿了，小的接着穿，一个个传下去，直到没人能穿为止”

有一次在罗瑞卿出差时，管理部门将他家孩子睡的铺板换为铁床。他回来后，立即把管理部门负责人找来批评他们这样做不对，管理部门解释说：“别人家也都换了。”他才不再说什么。但在三反运动时他在大会讲话时又就此事作了自我批评。

1965年，罗瑞卿的大女儿罗峪田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前罗瑞卿问她：“你的第一志愿报在哪里？”峪田答：“总参。”罗瑞卿严肃地摇摇头：“我在总参，你就不能到总参来。”于是峪田便分配到内蒙古，一干就是10年。

罗瑞卿有两个妹妹。一个在张家口工作，因触电事故不幸逝世，她的子女现在在内蒙古。罗瑞卿的另一个妹妹在四川南充老家务农。对这个妹妹他不时寄点钱予以帮助，但又关照家乡的政府，不要给任何照顾，他妹妹有点抱怨，他便写信进行解释、教育。

罗瑞卿十分谦虚谨慎。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只要下级对他稍有特殊，他立即提出加以制止。

1952年1月24日，罗瑞卿看到东北公安部批转辽西省公安厅一份报告，在批语中说：“辽西省公安厅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东北局及罗部长的历次指示，将三反运动深入一步。”罗瑞卿立即批示：“以后各地报告只准提党中央、毛主席，不准提罗部长，尤其把罗部长与党中央、毛主席放在一起，更是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就是典型，别的地方似乎也有。请你们严重加以注意，哪里有了，就向哪里提出要他们纠正，这个报告的错误也要打电报或打电话批评，并要他们纠正。”

1952年6月，罗瑞卿到旅大市视察，在公安局礼堂参加晚会时发现礼堂四周挂了一些语录牌，大部分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也有一条是罗瑞卿的。第二天在听取市公安局领导汇报时，他严厉批评道：“你们选领袖的语录是应当的，但怎么能选我的讲话呢？你们懂不



1953年，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舰

懂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你们政治上很幼稚。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怎么能把我的话同毛主席、周总理的话并列呢？要马上把选我的话的那一条取下来，今后再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他离开旅大时又专门给市公安局领导写了一封信，对此事再次提出批评。

50年代，罗瑞卿去河北省视察工作，发现省公安厅专门派了警卫处副处长跟车警卫，立即让河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叫这位副处长回去。他说：“我这样的干部不需要警卫。”

到安国县时，按省委和地委指示，县里给他腾了一个院子作为住所，还配备了做饭的大师傅。他对县委书记说：“我这次来就是了解公安工作的，不麻烦县委，我就住在公安局。”

公安局李局长急忙说：“公安局没地方住。”罗瑞卿说：“就住在你住的地方，你另找地方住。不要配大师傅，我就在公安局食堂吃饭。”李书记说：“那就按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办。”罗瑞卿立即纠正：“我不是中央领导，我就是个公安部长。”他在安国县公安局待了两天三夜，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大灶饭。伙房要给他单炒一个菜，也被他拒绝。

到藁城县前，他先同河北省公安厅长打了招呼，吃住全在公安局，不喝牛奶。到藁城后头一顿早饭就看到了牛奶，他问厅长是怎么回事，厅长说：“县局同志同我商量过，他们有现成的奶牛，我同意了。”罗瑞卿不再说什么了，但牛奶仍然一口未喝。

罗瑞卿经常教育干部：“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7年他到四川视察工作，省委秘书长提出要搞个专场，请他看川剧，他急忙阻止：“不要买票。”他又再三嘱咐警卫科长郭金生：“不能把群众赶走，要照常卖票，否则我

不看。

1959年3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副总理。当时副总理一般都是行政3级，而罗瑞卿在50年代定级时为行政4级。于是，有人提出：罗瑞卿应调为3级。罗瑞卿坚决反对。以后曾几次酝酿为他调级。1965年1月，陶铸任副总理，罗瑞卿即以陶铸亦为4级为例，说明不应给他调级。他直到逝世一直是行政4级。

再任军委秘书长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十年“文革”结束了，罗瑞卿的人生和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7年8月12日，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被任命为中



1977年9月，罗瑞卿接见参加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的海军代表队的演员

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后说：“我已经 72 岁了 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我要把 72 岁当作 27 岁来工作 把 ‘文革’ 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罗瑞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治军之纲狠抓军队的整顿。

当时军队内部问题成堆，邓小平在 1975 年 7 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肿、散、骄、奢、惰”状态仍未改变。罗瑞卿以整顿为纲，开展了全方位工作 在思想、作风、组织、军事和国防科技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

1977 年 3 月，罗瑞卿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 他提出 要在全军开展‘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讨论。随后《解放军报》组织撰写了 10 篇文章，在当时最迫切需要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的 10 个问题上 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 保持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8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作为邓小平的助手，复出后便首先抓整顿，并将邓小平所说“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

各项工作的纲。从1977年秋天开始，罗瑞卿即围绕整顿，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在思想上，他力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他大力支持《解放军报》揭露林彪“四人帮”极“左”的面目。当他在一份文件中看到提及活跃在“文革”期间的“风派”和“震派”人物后，他对起草文件的同志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也是一种危险人物。”他建议《解放军报》撰写专文揭露这三种人。当他看到这些文章后，高兴地说：“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在作风上，他主持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即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懒、散”，整顿官僚主义和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

在组织上，他积极批转信件，主持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清查了“三种人”。随后调整了领导班子。

在军事工作上，他主持战略委员会，重新分析研究国际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

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上，他对军委决定的重点抓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的研制组织大力协调，同时抓紧常规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逐步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1978年1月29日 罗瑞卿(坐轮椅者)在杨勇陪同下视察海军南海舰队榆林基地

在基层工作上 他强调从严训练和管理 恢复和发扬光荣传统，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正规秩序，减少和消灭各类事故。为了推动部队建设，他十分注意运用先进典型。在他倡议下 航1师、硬骨头6连、神枪手4连等单位都受到了表彰。

罗瑞卿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时 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所谓“两个凡是”就显然是党和军队迈开大步前

进的阻力，必须破除它的禁锢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罗瑞卿立即发现了此文的重要意义，他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要在军报上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罗瑞卿复出工作近一年时间，虽然他身残年迈，但壮心不已。他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地干。他桌上的文件卷宗越来越多，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为了节省时间，他工作时不喝水，以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腿也不摘，和衣躺一会儿了事。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室。面对国家、军队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百废待举的局面，罗瑞卿想赶快干，趁自己头脑仍然清楚，精力还算充沛的时候，多干工作，以追回他因受迫害而失去的十余年时间，尽力弥补国家和军队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突然辞世

1978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安排罗瑞卿赴西德治病到医院检查后，准备8月2日动手术。

8月2日上午7时，罗瑞卿被送进了手术室。

中午12时左右从手术室里传来消息说手术顺利完成，手术是成功的。守候在病房里的郝治平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掩面痛哭起来，她急着要见罗瑞卿，但医务人员拦住了她，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

到傍晚，郝治平又等来了消息，说罗瑞卿已经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了，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说了：‘Goodevening, Thankyou!’那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郝治平又等啊，等啊，一直到晚上12时多了，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回到旅馆里去休息。

她刚躺下，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接着有人敲门。郝

治平预感到情况不好，匆匆起身向医院赶去。等她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与世长辞了！

病因是：心肌梗塞突发。

时间是：波恩时间 8 月 3 日凌晨 2 时 40 分。

北京时间为 8 月 3 日上午 9 时 40 分。



1978 年 罗瑞卿在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

噩耗迅速通过电波传回了祖国的心脏——北京 又
传向祖国各地。

得悉此讯，举国震惊。

邓小平扼腕长叹：“太不幸了 太不幸了！”此语既为
突然失去战友而悲伤，也为正值用人之秋而栋梁忽折而
痛心！

8月4日 老将军张爱萍得悉消息 痛心疾首。想到
7月17日，罗瑞卿在赴德途中于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
时，还通过电话告诉他，治好腿有99%的把握 还信心
十足地表示：“现在我还坐轮椅 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
杖了！”回忆与悲痛凝成了《痛悼罗瑞卿同志》的诗章：

曾忆长征险阻多，闽侯未志养沉疴。

万物逆旅沧桑变，百代过客如穿梭。

哀音忽传震海内，泪洒长城齐枕戈。

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

杨勇将军闻此噩耗，悲痛万分，彻夜难眠，深切地
怀念之情涌流笔端：

一个多月前，敬爱的罗瑞卿同志还在领导我们贯彻
落实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任务。我在全国
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他逐字逐句精心修改和审定的。
他把这次会议准备就绪之后，对我说，他要去治病，

回来后还要同我们一起出去看地形……万万没有想到……我党失去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我个人失去了一位敬爱的首长和良师……

这出人意料的噩耗使杨得志将军心头悲痛萦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写道：

这次来京途中，我心里想，到北京之后，一定要再去看望罗瑞卿同志。这位曾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我军杰出的领导人，是我的老首长。……在电话里没有找到罗瑞卿同志，我深感惋惜，内心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在新的长征路上领导我们大步前进。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传来的却是出人意料的噩耗——罗瑞卿同志逝世了！……记得今年春天他路经武汉时还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壮志未酬，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对我党我军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噩耗传至皋兰山下，黄河之滨，萧华将军望着西北高原的辽阔云天，听着使人心碎的讣告，不禁泫然泪下。他沉痛地回忆起3月和罗瑞卿同志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

当时，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罗瑞卿同志因病住院，

我到医院去看望他。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跨越千山万水的双腿致残，加上遭受长期折磨后积染的疾病的袭击，迫使他躺在病床上。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询问我的工作、身体和一家人的生活情况……这次会见，使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罗瑞卿同志崇高的品质，顽强的革命意志，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对同志的无限热忱。他虽然受到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而且身患重病，但他一再表示要争取时间，多做工作……当他谈到这里时，两眼炯炯有光，神情十分激动。他这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革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闪出了难以抑制的泪花。我想，敬爱的陈毅同志的著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不正是罗瑞卿同志的光辉写照吗？

从老将军到著名演员、著名作家，从当年的抗大学员、野战军的干事到解放军广大官兵，从公安战线的领导人到国防科工委的科学家，特别是解放军三总部、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解放军报》社等曾在罗瑞卿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纷纷写文作诗，追念这位可亲可敬的罗大将。《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所作的《祭罗瑞卿同志》组诗中的一节，表达了人们的共同的感受：

长歌当哭痛未定，
忍悲挥笔不尽话。
一首诗成人亦苦，
海天心祭不需花。

8月5日 中共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迎回祖国首都北京。



1978年8月5日 罗瑞卿的灵柩运回北京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灵，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右四）率子女及亲属守候在灵柩旁

8月12日，罗瑞卿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

在肃穆的气氛中 邓小平浑厚而沉痛的声音震荡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 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坚决捍

卫毛泽东思想，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维护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革命学风，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坚决保卫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痛绝。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以顽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组织实施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罗瑞卿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 50 多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深得党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罗瑞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主要参考书目

1. 《将帅轶事》 胡志刚主编 华艺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2. 《十大将用兵韬略》 王乾都、蔡世经主编 黄河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
3. 《军事家传略》(下) 张如贤、刘培一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4. 《一代元戎——大将徐海东》, 张麟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5. 《一代元戎——大将王树声》 范江怀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6. 《一代元戎——大将谭政》 乔希章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年1月版；
7. 《一代元戎——大将肖劲光》, 胡学庆、孙国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8. 《一代元戎——大将张云逸》 于波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年3月版；
9. 《一代元戎——大将黄克诚》, 郑博、肖思科主

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10. 《十大将传记——粟裕大将》 郑乃臧、王楠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1. 《十大将传记——罗瑞卿大将》 穆静、冰如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2. 《十大将传记——谭政大将》 乔希章主编 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3. 《十大将传记——陈赓大将》 左波主编 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4. 《十大将传记——黄克诚大将》 左林、周航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5. 《十大将传记——张云逸大将》 罗永平、曾傅先 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16. 《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 黄瑶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17. 《开国大将的故事》 石仲泉、陈登才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

18. 《大将许光达》 王嘉翔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19. 《开国大将的晚年岁月》 许农合主编 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20 《开国十大将之谜》 木兰主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版；

21. 《大将粟裕》 徐学初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22. 《新中国第一代 一一一军兵种、大军区司令员卷》 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23 《中国十大将》(上、下卷)王晓明主编 长征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24. 《将之战》 多人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

25. 《世界著名军事家的少年时代》(续)陈春华、谷丰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26. 《中外名将实战录》 王虎、秦晓周、贾俊明主编 北京 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附：阅读测试题

一、填空题

1. 1906年3月21日罗瑞卿出生于_____省
_____县_____村。

2. 1927年上半年经_____、_____介绍，罗瑞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在西安期间，罗瑞卿协助周恩来等人，为贯彻中央正确的_____和_____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西安事变的_____。

4. 1955年，罗瑞卿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
_____勋章、一级_____勋章。

二、选择题

1. _____中我军活捉了敌第52师师长李明。
- A. 双桥镇战役 B. 黄安战斗
C. 登仙桥战役 D. 十万坪战役

2. _____ 罗瑞卿由于工作成绩优良 荣获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A. 1931年 B. 1932年

C. 1933年 D. 1934年

3. 清风店战役 是 _____ 第一个翻身战。

A 东北野战军 B 西北野战军

C. 华中野战军 D. 晋察冀野战军

4. 1946年，周恩来让罗瑞卿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 _____ 长。

A. 卫生部 B. 公安部

C. 交通部 D. 文化部

5. 罗瑞卿逝世于 _____。

A. 苏联 B. 德国

C. 中国 D. 法国

三、问答题

1. 1927年，罗瑞卿是怎样惩罚洋人的？

2. 罗瑞卿写的第一个剧本叫什么名字？

3. 1948 年秋 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毛泽东提出了什么方针？

4. 毛泽东提出的“延安精神”是什么？

5. 罗瑞卿主持开展三查三整的整党整风运动以什么为中心？